

中国走向霸权军国的危险性与和平崛起的安全阀（上）

夏

刚

一、在“恐龙”时流中由“超限战”新潮透析中共安保机制传统及指向

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实力及影响力日趋增长，也由于中国在平定天安门事件、阻止李登辉连任时显示出强硬态度，国际社会上“中国威胁论”抬头并派生出若干变种，如部分出于不愿中国强盛之主观愿望的“中国崩溃论”。然而关于经济统计水分、发展过速泡沫、“世界工厂”虚幻等指摘，在诱发国际素材市场猛涨的“巨龙爆食”¹⁾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于是厌中、排华潮又转向畏惧“新大霸”的“恐龙症”。

外界的忧虑如鲁迅《狂人日记》主人公多属受难妄想，但客观而言又不排除“怕的有理”成份。苏联解体后的美国极超独霸受“9.11”恐怖袭击及国际社会谴责攻占伊拉克而动摇，多极新战国时代的中国崛起不免被疑为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再来。中国自顺利回收香港及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护堤作用后自信骤增，进入胡锦涛时代后又因打进载人宇航俱乐部及主办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而加强了大国意识。从援救印度洋大海啸、建构东亚共同体即可看出其责任自觉和积极战略，而活跃空间的拓展又导致产生摩擦、卷入对抗。

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翌年海南岛附近美中军用机相撞，揭开了中国不得已对外冲突之连续剧的序幕。点燃抗美、爱国情绪的两次纷争以美国赔偿致歉了结，对比百年前甘受8国联军欺辱，使国、民继香港归还后再次颇感自豪。而其后东北亚民族主义群情激昂的旋风使“汉流”、“韩流”和“日流”由暖转寒，98年江泽民访日后的中日“政冷经热”现发展到全面僵局，92年建交以来的中韩蜜月也随高句丽历史认识分歧而告终。东海新近勃发的中日石油天然气采掘权益之争，似亦将现于南海中越、中菲之间。

2004年11月中国核潜艇迷航冲绳周边日本领海遇强烈反应，被海空自卫队紧追至中国领海后以赔礼息事。翌月日本政府通过的新防卫计画大纲自1976年制订以来首次表明对中国的警惕，尤其关注中国在推进核弹、导弹战力及海空军现代化的同时扩大海上活动范围。05年2月美日安全保障协商会议将和平解决台湾海峡两岸问题作为战略目标，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抗议干涉内政。这一系列变故不妨视为各怀海洋国家志向的3国之间的合理冲撞，而日本在美国怂恿下走上对抗中国的前台给东北亚平添了一分地缘政治紧张。

04 年 11 月于老挝举行的亚细安及日中韩首脑会议决定翌年底召开首届东亚顶峰会议，而当月的中国潜艇误入日本领海事件及中日总理在“ASEAN+3”会间晤谈不欢而散，预示出 05 年未必按世间善良意愿成为“东亚共同体元年”，而毋宁会化作“东亚共同体幻想泡沫崩溃元年”。小泉总理 02 年初在新加坡首倡“东亚共同体”时其实未加深思²⁾，其 04 年 5 月再次访朝的失败又证明东北亚问题盘根错节、积重难返。朝鲜半岛南北、台湾海峡两岸民族隔阂这两大“瓶颈”，恰恰在 04 年作为大区安保危机的热点同时凸现。

2000 年国民党政权被特洛伊木马从内部瓦解，陈水扁揭去李登辉“特殊两国”的修饰鼓吹“一边一国”，背离两岸为一国的“92 共识”而搅乱了与大陆安稳共处的现状及前景。陈在蹊跷的枪击剧帮助下侥幸连任后“绿”（台独）、“蓝”（反台独）两派隔阂加深，而地盘下沉的同时又强化了与往年盟友的挂钩。中国潜水艇受日美合伙监控据陈宣扬便是台湾通报挑动结果³⁾，美日描绘的“2 加 2”讲和模式实际上是“3 对 1”新月型包围圈。不甘被动的中国旋即推《反国家分裂法》出台作统战、外交理论武装，于是伊拉克战后由美国“先发制人”企图而一时黑云压城的朝鲜核紧张，让位于中台间山雨欲来的僵持升级。

中台对立之复杂首先在于不像朝韩各成一国并受世界承认，也因为走向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大于朝鲜半岛。世界上部分人担心动武事态无论抱善意或怀邪念都非空穴来风，上述中国核潜艇游弋至关岛美军基地周围⁴⁾又增加了一道待解的中美抗衡难题。与政治大国化联动的军事大国化早以成为中国的现状，而经济大国化的实现是否意味着蜕变为霸权强极？中国试图用“和平崛起”的口号打消天下的顾虑，但李光耀所称的这条“尾巴特长的龙”⁵⁾有无亢进暴跳之虞，有必要在喧嚣和骚动中冷静地深入探讨一番。

1996 年 3 月台湾大选前夕中国举行针对性军事演习时，两位刚过不惑之年的军队文官际会于福建前线诏安小城。在美军航空母舰特混编队赶来插杠的剑拔弩张之中，“眼中形势胸中策”之慨促使他们著书浓缩各自军事思绪。在 1999 年 2 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刊行的《超限战——两个空军大校对全球化时代战争与战法的想定》中，乔良（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国家一级作家）和王湘穗（航空兵某师副政委，后调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独辟蹊径，扬弃海湾战争赢家的建立在高科技、巨富基础上的先进军事理论，提出了可超越实力局限制约的崭新战争方式。

其问世后的反响 2 年半后一跃而震荡世界，因在书中作为恐怖战典型十多次登场的本·拉登策划下的那场劫机撞击使下述预见成为现实：“武器新概念正在打造与平民生活紧密相连的武器。……新概念武器的出现，肯定会将未来战争提升到普通人甚至是军人都难以想像的水平；……武器新概念将使普通人和军人一起对自己身边习以为常的事物也会成为进行战争的武器而大感骇异。相信人们会在某一个早上醒来时吃惊地发现，许多温良和平的事物都开始具有了攻击性和杀伤性。”该书还超前地言中了“9. 11”事变的种种特征，如非国家组织进行非军事战争行动的危险，及“非对称战”呈露超级大国的脆弱。

乔良在近未来军事模拟长篇小说《末日之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中，异想天开地编织了中国驻香港军区司令部中校参谋与国际恐怖组织在全球范围展开的高科技较量。其畅想、文采或许会使读者此次有“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的感受，但《超限战》却非作家的艺术虚构而是理论家的学术假说。上卷《论新战争》首句——“技术是现代人类的图腾”即提示了哲理性、科学性，全书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数重领域而以历史、哲学、科学等多管齐下。扑朔迷离、似明若暗的风格使之犹如兵法常态的天书，故更需要为窥测天机、寻求启示而把握主眼、拎出主线。

“超限战”如作者定义是超越一切界线、界限的战争，书中主张突破的物理界线有空间层次的国境和战场、时间层次的时代和世代，心理界限则有既成观念的框架和伦理束缚等。作者由“非战争军事行动”（战时、战场外的军事行动）概念，衍生出“非军事战争行动”（跨人类社会所有领域、超越军事对抗形态的战争），以此作为未来战争的新方向加以倡导。一系列别开生面的新概念武器、战法的设想、分析，乍看之下如光陆离奇的万花筒旋回跃动，而在五花八门之中最终又有条有理地推出了众妙之门——多重组合。

打头的“超国家组合”，是国家、地区或世界规模的超国家组织（如欧洲共同体、东盟、欧佩克、亚佩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组织）、跨国组织和非国家组织（如跨国公司、行业组织、绿色和平组织、奥林匹克委员会、宗教机构、恐怖组织、黑客小组）的合纵连横、联手结盟。比古典式“联盟+联军”的现代版——海湾战争多国联军更进一步，与超越国家框架的新势力相结合是其特征。被举作典型的实例之一，是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援助交换实行变相的经济占领。

其次的“超领域组合”，指军事、超军事、非军事领域的作战样式（军事领域的原子战、常规战、生化战、生态战、太空战、电子战、游击战、恐怖战；超军事领域的外交战、网络战、情报战、心理战、技术战、走私战、毒品战、虚拟〔威慑〕战；非军事领域的金融战、贸易战、资源战、经援战、法规战、制裁战、媒体战、意识形态战）与其领域内外别种类型自由结合，如本·拉登对美国的国家恐怖战+情报战+金融战+网络战+法规战。

随后的“超手段组合”，谓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如军事领域的战略战术、军事威慑、军事联盟、军事演习、军备控制、武器禁运、武力封锁、使用武力；分属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宗教、媒体等领域的经济援助、贸易制裁、外交斡旋、文化渗透、媒体宣传、制定及利用国际规则、利用联合国决议等准军事手段）、各类方法（如哲学方法、技术方法、数学方法、科学方法、艺术方法），诸方法与军事结合产生军事哲学、军事科学、军事艺术等，而复合手法之一例是以货币贬值诱发别国经济危机。

压轴的“超台阶段组合”，为战争规模及相应战法的4层级（①以超国家和国家为上限和下限、以战争的政治策略为主的“大战—战策级”；②国家级、军事策略或战争策略的“战争—战略级”；③小于战争而大于战斗的作战、讲求艺术的“战役—战艺级”；④最基本规模的作战行动的“战斗

一战术级”)的各层规模、战法的互换和组合,如本·拉登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战略级威胁的纯战术级爆破,及美国以战术手段对此进行的战略性报复。

接着《万法归一:超限组合》的最终章《必要的原则》中,“超限战组合战”的主轴、法则被归纳为“全向度”、“共时性”、“有限目标”、“无限手段”、“非均衡”、“最小耗费”、“多维协同”、“全程控制”。“超国家组合”等作为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及战略利益的最强利器,被描绘成可与美国的“超级武器”匹敌,而其根本威力在于大胆突破伦理基准和原则规范的不拘一格、别出心裁。作者称按“超限组合”思维转动万花筒可产生无数变幻自如的战法,而显龙云相生、浩瀚飘渺之观的此书确有孔明八卦阵或俄罗斯魔方的神奇魅力。

这株“领新标异二月花”的非对称、反正规、破常套,“删繁就简三秋树”便可浓缩为“剑走偏锋,出奇制胜”,但避实就虚的剑锋并非一味玩弄玄虚而是以偏引正。用于说明这一辨证关系而借用的汉语语法概念——“偏正结构”,亦能拈来玩味其“魔幻现实”的实质或理解“和平崛起”的重点。本书正如作者所自觉是世纪之交的军事新潮奇葩,而和 2002 年《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办)杂志上推出、在海外被误作高层“试探气球”追捧的“对日外交新思考”不同,其思考、志向带浓重的“硬派”、“鹰派”色彩并含不容忽视的信号、份量。

作者属军中司语言、情绪的“右脑”部,此书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刊行,故易被视为“空对空导弹”,但军内职务和社会制度的约束及中共军踏袭的《三国演义》的“军中无戏言”传统,决定了无信口开河的可能。由此想到同是军人作家出身的空军副政委刘亚洲据传在基层“侃大山”时道:毛泽东建国初期就讲过我党要养一批敢于胡思乱想的人,当时叶剑英之子岳枫(总政联络部长)自告奋勇报名。作为李先念之婿而闻名的这位中将赞同美国兰德公司的“保护怪论”宗旨^①,而怪论过一段时间往往成真理的规律值得深思。

改革开放 20 年后第二次解放思想浪潮来临时,当年针对毛泽东时代教条主义的“离经叛道”论早已化作常识。《超限战》的“妄言”因比小说更离奇的现实发展之快也褪去了惊世骇俗的印象,毋需琢磨不可全信中有多少不可不信。此书将怀胎前风靡对岸绿岛的战争模拟小说《一九九五闰八月》(郑浪平著,商业周刊出版公司,1994),旋即被淡忘乃至被贻笑为危言耸听的骗局或受疑作台独派谋略,此岸本书则因著者近其位可参其政等故而不减警世恒言作用。非心血来潮而孕含血潮的杀机可谓“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而放矢之的在于对抗头号强敌——美国,及实现百年大业——统一祖国。

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朱苏进(1954—)在与乔良同时成名的“劫后”文艺复兴中,接连推出《射天狼》、《凝眸》(1982、84,均双获全国中篇小说优秀奖及解放军文艺奖)、《第三只眼》(86)等军旅佳作。“第三只眼”90 年代由包装上洋人名的国内政论著作作为流行语,而以超前、超常眼光审时度势、推陈出新的《超限战》显示,军、国的“今日长缨”欲缚对象冷战后已无“西北望”圈域而集中到东南旧山河。《凝眸》突破禁区以败将之子反思挑开解放军最大创

伤——强攻金门惨败，而刘亚洲新近在因特网上引起世人注目的振聋发聩之言⁷⁾中，总结金门受挫教训、探讨解放台湾谋略占了相当部分。

萌发《超限战》念头的台湾海峡军事演习本是一个巴掌不响，陈水扁在“立法委员”时代著《跨世纪兵法——陈水扁看国防政策与管理》（1992）、《国防黑盒子与白皮书》（96），考虑到当时台独势力尚弱而后羽毛渐丰继而一飞冲天，就可见两岸在水面上下较量之深、烈。同样出生于朝鲜战争爆发后（户籍为1951年2月而实为50年10月）的陈在海湾战争后和台海危机之际，已敏感地分别与两位智囊合作⁸⁾探讨两岸抗衡、勾勒防卫战略。《超限战》初出时在大陆被讥为顽童一味制造“狼来了”虚惊⁹⁾，而“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的冷嘲不久就被“春江暖鸭先知”的赞叹盖过。人们还惊讶地发现《末日之门》在八字没一撇时即有言在先：新世纪头年台湾大选揭晓，民进党获票首次超过了国民党，成了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非国民党执政党。

《超限战》问世未久五角大楼便译成英文贴到网上¹⁰⁾，证明了这部跨世纪兵法黑盒的魅力。而《超限战》首家正式译本“9.11”3个月后才在日本先于美国出台¹¹⁾，可释为周边国家对其远瞩近攻指向的热心反应。《末日之门》的电脑病毒毁灭世界危机被中国陆军中校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少校联手拯救，而乔良当时寄予期待并构思了与俄大战的日本却将中国视为假想敌，情报干部就早参与了日、台、美学者、智库的《超限战》研究¹²⁾。

该会成员藤井严喜（1952—）在《超限战》日译版问世1周前，推出《由恐怖活动到超限战争——战场无所不在》一书，标题、副题均取自读解对象而论旨亦围绕两位同世代中国军人作家引发的思辨。该国际关系分析家在《“日元”消失之日》（2001）中对本国经济战败失望，在《日本复苏的王牌：石原慎太郎出任总理大臣》（2000）中将强硬派当政作为出路。沿用石原坚持的“支那”名称显现了反共、反华立场，而其顶礼膜拜的那位小说家出身的“大说家”，与先以小说成名又立大说的乔良之间有超越年龄、见解之缘。

石原23岁以《太阳的季节》摘取纯文学桂冠芥川奖正值乔良出生的1955年，主人公青年用阳物挑开纸门的轰动性场面可称“超限”突破，其放荡、挑战有30年后同样年轻走红的“无赖派”王朔（1958—）的先行之观。石原弃笔从政后于1995年任国会议员满25年之际不满于国家意志被阉割而退出政坛，整4年后又称基于怀忧国情念出任东京都知事，而《超限战》在台海军事演习中萌思和出台正是这两年。石原的“鹰派”在日本成主流而乔良的“硬派”在中国为中流，作为两国当今对立的表现和背景饶有趣味。

藤井从《超限战》中感到“中国军部的可怕本质”，称作者“9.11”后视悲剧亦属美国外交政策的牺牲与侯赛因别无二致，这类指责不乏有色眼镜和信息不够而致的误解和偏见，但对原著的重视和社会、历史、文化等软领域视角值得首肯、玩味。他认为从孙子到毛泽东的中国军事思想可归结为动员一切手段打赢战争，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于为抑制残虐性而制定规则并将战争本身文明化的欧洲人、在战斗行为中都追求审美和伦理的日本人，这和关于日本式恐怖活动有别于不择对象的“9.11”袭击的论证一样有趣。

评论家宫崎正弘也属右倾论客并大量散布“中国威胁一崩溃”说，而其对本国的警告中值得共鸣的是“比心”之误、“读心”不足。他称日本人被汉诗的优美吸引而忽视中国人的现实一面，又指出近来中国的政治研究套用美国式手法重举数据而轻解心路。¹³⁾ 乔良创作之路的起点之一一是“文革”中与高尔基作品邂逅¹⁴⁾，而与毛同出身于“青山大学”的那位苏联作家的“文学即人学”命题在此别具启迪。国家、地区间的地缘政治紧张说到底还是人际对立的结果，投资环境等的“国家风险”也可归结为物质、精神风土之危险。

世人往往只见风动、旗动而难看透背后心动，热风吹雨洒江天之中却尤需冷眼向洋看世界的“离见之见”¹⁵⁾。《超限战》也在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热闹之外的灯火阑珊处潜藏了门道，其“边锋思考”如古代文章大家似敲边鼓却下下送到中心¹⁶⁾，扣击枢要的弦外之音才是这部未来战争启示录的精髓。从其思绪和思路中可窥见中共军事新潮的大背景、大趋势，而在破解这一层层相扣的中国套匣所内含天机时，不难发现若干酿成此书又高于此书的原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邪者见邪、恶者见恶，本文笔者认为以下诸点尤当留意。

1. “非对称战争”本是中共军看家本领，此次出台可谓老本翻新，而新瓶包装给陈酒带来了新面貌、新水平。

后工业社会最棘手的“非对称战争”、“人民战争”，正是中共军多年来引以为豪的“克敌制胜的法宝”。打败日本侵略军的游击战和粉碎国民党军的运动战，也是弥补兵员、火力不足的扭弱为强、转劣为优战法。相反，中共军史上“对称作战”则多遗下失败教训。抗日战争中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受到毛泽东指责，“文革”后对彭的政治平反也未能给这段历史带来荣光。红军在反蒋军“围剿”时一度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指挥试图正面决战，正如毛讽刺的是类似乞丐与龙王比宝而注定败北的消耗战。

毛在遵义会议上重入领导层并被推为党、军舵手，正是靠早期反“围剿”中展示的“乞丐”以“跳蚤”战法挫退“龙王”的指挥艺术。其后的神格化也有赖于“用兵如神”的神话，与他颠倒了主从关系的周恩来就对“四渡赤水出奇兵”佩服得五体投地。而那段神出鬼没的妙笔在毛走下神坛后，在“新长征”路上仍不减传奇色彩、传神效果。建国后毛指定为国家文化建设重点项目、对历代朝野影响甚大的《辞海》，在邓、江时代的修订版（1989、99）中依旧保留“四渡赤水”词条，就是视为光辉范例、精神财富的明证。

周欣赏根据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诗作的《长征组歌》（1965）并指挥片断、教唱他人，而新时期的“谱写新篇章”离不开继承精华、繁衍基调。温家宝谈任总理 1 年的心境、抱负时引了两段楚人之诗：“路漫漫兮修远矣，吾将上下而求索”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对古今先哲、前辈的踏袭又与毛泽东对屈原的倾倒相重合，而毛以平生最得意¹⁷⁾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收尾的《忆秦娥·娄山关》（1935），在“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的“蝉联（蛛丝）体”¹⁸⁾中，预备了一脉相承、藕断丝连的伏笔。

创该词牌的李白作中“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投影于毛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的“可上九天揽月”也套自李白“欲上青天揽明月”。其化用前人（日式说法为“取本歌”）乃中国诗词惯技，而《超限战》同样不像孙悟空是石头缝里孤零突兀蹦出。军人家庭出身的乔良为读解毛之心灵而沿长征路走了一遭，其为描绘红军诗史的采风又带描红临摹性质。此书看似与经典兵法大相径庭而其实从蛛丝马迹中不难发现，其随意发挥的华彩乐段仍包含在建军 70 余年的传统框架中，正如邓的改革、开放未离中共基本原则。

毛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一笔写在“人无三分银”的贵州，颇符合一穷二白可作最新最美画的“精神胜利法”。中共空军初出茅庐即与美军打平手亦可算双层精神胜利：空中“拼刺刀”除牛犊不怕虎的猛威奏效外，非正规的“无战术”也足具使敌猝不及防的神奇¹⁹⁾。由毛、周青睐升为“国酒”的茅台便浓缩了这类“乞丐”气概，而这一贵州特产夺得 1915 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银奖据说多仗破瓶散味的豁达怪招。正如毛钟爱的落魄江湖载酒行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之一的佳吟，《超限战》风格也可谓“石破天惊逗秋雨”。

贵州至今不但未摘掉最穷地区的帽子反被“首富区”拉下更多，正如陕北战时养护中共中枢多年而建国后却未得回报²⁰⁾一样是历史悲剧。胡锦涛 80 年代中期任贵州长官与雌伏倒数第 2 穷省——甘肃，及赴任连周恩来都碍于高原气候而被中央禁止涉足的西藏²¹⁾，博得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称道。其高升所证明的“穷则变，变则通”也显现于贫镇特产“国酒”。胡接任的贵州一把手朱泽厚调任党中央宣传部长后提倡“宽松”而随胡耀邦遭撤职，而另一方面茅台酒为适应商品经济潮流和西化时尚推出了中度数品种。

葡萄酒人气超过白酒的“红胜白衰”与冷战后淡化、温化氛围相称，而在过时危机中为拓展销路的“一酒多度”又来自茅台反复兑勾、陈酿的多重性。田中角荣夸茅台提及 60 度（高于标准 7 度）时毛驳“谁说的？是 75 度嘛”²²⁾，除不懂行外或许掺带“以烈为贵”的想当然。后毛时代的 43 度、38 度按其标准当归入“修正冒牌”，而西部开发对象的四川、贵州盛产名酒有“不辣不革命”味道。8 大名牌中四川郎酒亦由赤水制成、经红军 4 渡时光顾产地，茅台点化于明朝晋商引来汾酒工匠，而乔良老家山西酒、醋俱闻名全国，二者都是愈陈愈香、越浓越酷，《超限战》的高度刺激亦是提炼中共军原汁沉淀而来。

2. “超限战”设想出自空军，符合解放军的兵器、战法“高、精、尖”志向，凸现国防、科技现代化的“富国强兵”本质。

毛泽东一贯否定“唯武器论”并形容美国原子弹是“纸老虎”，但他立为国是的 4 个现代化里国防和科技即占一半。周恩来 1954 年首次提出的“四化”中交通运输 10 年后被科学技术取代，而同年任主管武器装备的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 2 年后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航空委员会首届主任，58 年又任国务院科技委员会、国防部国防科技委员会主任，成为科技的地位上升和与国防结合的先声。主持核弹研制的国防科委跨其两领域而富于双重份量，由聂帅名副其实地挂帅充分显示了

中共对追求武器的高、精、尖不遗余力。

毛的侄子毛远新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而后升至沈阳军区政委，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而后被任命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受“文革”前期正、副统帅的意志影响的两人的学历和仕途都恰是国防和科技的结合。毛的长子在志愿军司令部参谋兼俄语翻译任上被美军炸死，中共军在内战、朝鲜战争中痛感兵器、技术的劣势，当是其背景和动力的一部分。“超限战”的倡议来自空军，结合一系列创伤和创业史就非偶然。

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向老帅叶剑英嘱托的两件要事，一是阻止“四人帮”扩大权势，二是强化第二炮兵的威慑力量。²³⁾二者都说明他的最大心事莫过于对内、对外两方面的安全保障，而将战略导弹部队作为民族危急关头的最后王牌，令人感到对较之层次高于陆军却仍多接近搏斗的空军更超越的终极性军事力量的希求。其通过提高科技水准来增强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意向，又意外地从他戒备和试图排除的“文革”主流派阵营中显出。

脚踏“4人帮”文人集团伙和林彪军人集团两只“贼船”的陈伯达，在1965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主张参照日本、东德的成功先例以电子工业为经济发展的中心。3年后又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任内写信给毛、林、周、康生、江青等人，建议加强电子工业以带动国防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这一所谓“电子工业中心论”在他倒台后，作为对“以钢为纲”既定路线的否定而受到批判。其“技术至上主义”与周恩来等务实派的真实想法相通，而指出与高度依存电子技术的空军的不满现状暗合的看法²⁴⁾也值得注目。

位居党内第4的陈起草的9大（1969）政治报告，被极左的“4人帮”指责为“鼓吹唯生产力论”，遭到他作为政治秘书效力多年的毛“枪毙”（作废）。²⁵⁾林彪任领袖接班人载入党章2年后即自毙，而周欲使党、国秩序正常化的批判极左思潮，却被毛将林定性作“形左实右”而顿挫，2年后的10大虽邓小平复活亦狂澜难挽。而13大（1987）不到2年后总书记因“政治风波”被撤换时，优先发展经济的既成方针却由于邓的旨意得以继承。

邓为挽回10年浩劫损失而呼吁改革开放，提出科技是“四化”关键并进而断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文革”后的至高任务，故此言意味着科技最优先的国、军战略，而海湾战争爆发1个多月后李鹏总理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予以披露也是意味深长。邓提拔为第3代党、军最高领导的江泽民，曾先于邓看好的李铁映任电子工业部部长（1983—85）。江在上海担当党、政负责人时兼上海交通大学（母校）教授并用英文撰写学术论文，其《论世界电子信息产业的新特征与我国的发展战略》（《中国科技论坛》1991年第1期），作为党魁在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理工科论考、规划而意义不凡。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聂力少将（聂荣臻之女）在人大赞扬的该论文²⁶⁾发表时机适逢海湾战争，而美军精密化大量杀伤武器的威力再次促使中国大力适应、急起直追信息技术革命。陈伯达的“一流电子化国家”设想当年因超前而未果，现今则已不算超常。与他提倡“电子工业中心论”时的职务巧合，江泽民长子江绵恒在美国获博士号后，经任职上海冶金研究所、工业学院和创办投资

公司、经营电讯企业，于 1999 年底升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这一年正是《超限战》问世之时，时年 45 岁的头号“太子”恰与两位作者同世代。

在江泽民动议下 1998 年成立解放军总装备部，首任部长曹刚川 5 年后出任国防部长，这一系列安排有必然性和象征性。曹从 1963 年任 12 年助理员以来一贯从事武器装备工作，在邓小平女婿贺飞手下任总参谋部副部长（1982—89），海湾战争翌年升任副总长，台湾海峡危机翌年接任聂荣臻女婿丁衡高兼国防科工委主任，又在该组织从军中分出的翌年被提作军部“第四权力”之长，这和邓、聂家族长期占据要职一道显示了该领域的份量。

由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的武器装备部门独立的总装备部，在解放军指挥中枢内排原 3 总部之后却呈后来居上之势，可说是战争现代化时流导致的演变。曹 1956 年毕业于炮兵军机技术学校后曾赴苏联炮兵军事工程学院深造，而陈伯达提出“电子工业中心论”时援越高炮部队正由于美军轰炸遭受严重损失，设立第二炮兵也出自类似背景。海湾战争后的军事新思考，是继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第 3 次冲击的产物，及相应的 3 回变革的集大成。

“文革”理论家陈伯达在武斗高潮期提倡推进电子工业，在党代会政治报告草案中将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规定为“文革”宗旨，看似奇异却非独出心裁。他起草时依据的林彪口授“民富国强”论²⁷⁾，乃是中共领导人及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千古不易之己任。“文革”时代一边绝对强调意识形态，同时也不无生产、国防优先的一面。出于保权目的而一度默认个人崇拜的毛接受周恩来提醒，下令中止制造徒然耗费铝合金的领袖像章，其“还我飞机”的价值取向和 50 寿辰（1936）时在全国募捐购飞机的蒋介石一致。

由近距火炮飞跃到远程“火鸟”的第二炮兵，在周恩来主导下于 1966 年 7 月成立，和毛泽东发动“文革”并行的时期显示了“双轨”存在。同在“文革”元年的 10 月载核弹头导弹发射实验成功，12 月又先于法国爆炸成功氢弹，创下了首次核实验以来仅用 26 个月的最快记录。中共 9 大由毛定夺仍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基调，而整 1 年后发射的人造卫星“东方红 1 号”，和建国 50 周年过后无人宇航船“神舟 1 号”上天一样，是不受领导层变动左右的发扬国威的意志表现。

《超限战》强调机动性、尊崇高科技的诸多主张不排除空军本位思想，乔良与刘亚洲合著《中国空军攻防兼备要论》（2000）即显现对所在部队的归属意识。然而在连原国家队运动健将移籍的“海外军团”都各为其主的今天，对本军种的自卖自夸又可作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加以肯定。堪称“母乳”的国家预算更倾斜分配于这一“骄子”也属必然，因未来战争相当可能出现“制长空者制天下”局面。邓小平将“两弹一星”为中国赖以在当今世界被另眼看待的王牌²⁸⁾，而核弹、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都具“恐怖空王”²⁹⁾魔力。

富象征意义的是，江政权后期“副帅”（军委第一副主席）张万年是“塔山英雄团”尖刀，而离军史上最惨烈的那场阻击（1948）战场不远的葫芦岛军港一带，在毛写下“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当年诞生了杨伟利。2003 年该强击、歼击机双料中校驾驶员成为天字第一号宇航英

雄，巧应了“三十八年过去，……谈笑凯歌还”。“弹指一挥间”起点之年以林“副帅”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世界农村包围城市”论似已陈腐，但自居第三世界旗手的中国的延至太空的抗霸反包围却透出与时俱进的底流不变。

3. 本书启示了中国军事智术的高屋建瓴、外交感觉的行方思圆之奥妙：顶层的宇宙情思、核心的政治理念。

将古今、内外的见解信手拈来而自成一家之言的《超限战》，扎根于军事理论历来发达的中国传统之中。貌似异想天开的未来战争方策、战法的高度化、神秘化志向，尤其体现于奇袭战、佯动战、情报战、心理战等主张，其思路与将战略、战术作为“不可示人”的“国之利器”的兵家祖典《孙子兵法》一脉相承。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在红军大学的讲义）、《论持久战》（1938年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等军事著作，而这位中共军缔造者引来古为今用的“田忌赛马”故事，正是贯穿《超限战》的中国式“非对称战争”的源头。

日本评论家山本七平在《参谋学——读〈孙子兵法〉》（1986）中，对照往年在菲律宾战场上体验的日军偏重精神主义所致失败，惊叹《孙子兵法》的彻底现实主义之合理。³⁰攻敌不备的出奇制胜建立在坚实慎密的计算之上，其两面性在《超限战》深层也处处可见。解放军多年的3大指挥系统——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排列顺序和“智、仁、勇”一样启示着“智>仁”的价值观。“三达德”中“勇”一般居于最下，与《孙子兵法》开卷《计篇》的“将者，智、信、仁、严者”一致，使人愈觉日军轻视补给生命线而只顾猛进纯属蛮勇。《超限战》貌似过激而玄妙的纸上谈兵，却在忌避盲目的感情用事的理性控制上，显示了中国的军事理论之发达与平时、战时一贯的现实主义互为因果。

毛自认及公认的最佳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写于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与同期精彩军事论述叠出不仅因情势刺激加年富力强（其时的44岁左右恰是《超限战》上梓时两位作者的年龄）。“两论”原型为“7.7”前于抗日军政大学的唯物辩证法讲义，以辩证唯物主义指导革命、战争正可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两“半脑”（分别司理智、情绪的左脑、右脑）作为上层建筑，维护血肉、强化手足的总后勤部、总装备部担当下层建筑，亦显示着超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兵粮未动，理念先行”法则。日军战胜沙俄（1904—05）就多亏大本营高参的绵密想定，而陷入太平洋泥潭不能不归咎于无视了内阁总力战研究所调研班子模拟对抗演习得出的必败警告³¹。

胡耀邦总书记将吉田茂著《动荡的政治百年史》（1967）作为宝贵经验向干部推荐，而那位引导日本走出废墟、步入复兴的宰相在多部回忆录中，复述了1934年作为外交官访美时听以绰号“大校”著称的政治家豪斯忠告“无外交直觉的国民必定衰亡”。³²战败使吉田痛悔祖国未能接受忠告并引以为深刻教训，但直到外务省1993年终于就奇袭珍珠港时延误宣战的历史耻辱向国民

谢罪，及吉田指示外务官僚 1951 年总结的《日本外交的失误》报告同样隔 52 年才公布后，日本外交如中曾根康弘前首相所指出的拙劣依然如故。中曾根针对军国主义时代教训提出的外交 4 原则——“不做超出实力之事”、“不铤而走险”、“内政与外交不相互利用”、“顺应世界主流”³³⁾，仍未得到落实反倒有劣化趋势。

《末日之门》中虚构了“罪犯首相”之女大岛由纪子新世纪头年当选日本总理，而原型田中真纪子（田中角荣之女）2001 年任小泉内阁外长后，不断暴露出外交、政治上的幼稚无能而不到 1 年即遭更迭。但其秘书关于她如果是美国总统则可能凭感情冲动按导弹发射按钮的看法³⁴⁾，和日本近年来修改和平宪法、增强军备的势力抬头，使乔良笔下的日俄大战不无现实气息。小泉外交也被国内舆论批为赌徒盲动，为拉选票贸然再三参拜靖国神社的骑虎难下便招来了外交僵局，而战前、战后的一系列迷误根源在缺乏哲学和战略。

书法家、评论家石川九杨称中国、西欧的语言表现顶点为政治观念和宇宙情思，日语则短少这抽象、宏大的二者而适合浅近的写实、细腻的写生。³⁵⁾周恩来和基辛格对日本的鼠目寸光、故步自封的岛国根性均有微辞³⁶⁾，而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吹哲学”显现了中美共识的基础。《超限战》的博大精深、高屋建瓴令人联想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故主的饱识广闻，及《末日之门》中太空人俯瞰地球之恢宏飘逸。相形之下又可知中国的假想敌们的泥足巨人模样：战败 50 周年之际开始“第二次战败”以来的日本首相原来多不读书³⁷⁾，包括喜好军事幻想小说、漫画而读正经书不多的桥本龙太郎；在当年以“大校”的警告打动了日后日本首相的美国，五角大楼“9.11”遭难后一将军反省未倾听中国二大校的“超限”想定³⁸⁾，这一下天下大霸当今也因白宫官员思路多限于一朝一夕而同样患上了近视症。

《末日之门》中总参谋长驱车穿过灵境胡同从西大门驶入中南海，与为入定而静观警卫参谋钓鱼的国家、军委主席商讨南亚局势对策的场面。邓小平、赵紫阳最终居住的米粮胡同、富强胡同，国防部所在的复兴路和军委会议常开的三道门俱乐部，于前人起名、今人选址中体现了求荣、显威的取向，而“灵境”在此有与“红都皇居”丰泽园内静谷相似的韵味。该作品及《超限战》的符合空军灵活性的空灵境地也可用这二字形容，而作者坐上其肩膀的思想巨人中不仅有孙子，更有“兵形似水”畅想之源的“上善如水”老庄流。

毛泽东写于中苏论战中的《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在起首的“鲲鹏展翅，九万里”中流露了《庄子》开篇的烙印。该词与《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在死前不久的 1976 年元旦发表，暗藏“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批修倒邓意图。石川九杨直观的中国语言表现的顶点在此超越善恶地显示出来，而政治观念和宇宙情思既同时蕴含于儒家和道家之中，又分别集中地体现在各适于入世和出世的这两种哲理。毛放邓出山时赞其“politics（政治）强”及“绵里藏针，行方思圆”³⁹⁾，而联系中国的“外儒内道”⁴⁰⁾则颇富启示。

宋初确立的中国画“逸、神、妙、能”4 品（格）之名次⁴¹⁾，也与不能道、未可名者为高的老庄灵境相符。《超限战》泼墨写意挥就的逸念神思又通过李白的“俱怀逸兴壮思飞”，及《孙子·

兵法形篇》的“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使人联想到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空、海军横空出世及中国崛起“入世”。存乎一心而又不拘一格的运用之妙如回旋门或怪圈之变幻，而中国兵法的丰厚哲学基盘的最深处即是与“逸”同音的《易》。这部卜占预言集成为中国式思维的总“龙头”，说明《末日之门》序言点出的人类渴望预知未来的动机——“趋利避害”本能在这个文明古国尤为发达。

中华民国国父多次引“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祖反复讲“穷则思变”，二者变革思辨的根基都如其语源来自该经典。在华尔街常胜约 20 年的日本基金经理人大竹慎一感叹华侨、犹太人、欧洲人擅长多方位判断⁴²⁾，而中曾根指出的一对多外交为日本最弱项似也与多难历史孕育的多变数感觉之不足有关。20 世纪日本两次战败证明缺乏政治、经济、军事的经验和洞察则国易亡。《超限战》副题中对全球化战争、战法的想定也在《易经》包罗范围中，而乔良视为万理之本的八卦太极图的“阴阳鱼”造型，在黑白以曲线相隔又于点睛处内含对方的似云如雾意匠中透出了中央之帝的浑沌相⁴³⁾。

4. 兵法诡道的危言大计扎根于中国儒、道、兵、法诸家一体的实用功利主义。

《超限战》作者不讳言“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而为达目的往往不择手段又是中国的传统。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1532)将战争与宗教、道德分离，被认为是西方政治学的起点，而今人多用于指政治权术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在中国的源流，可上溯到其约 1800 年前的战国末期韩非子予以大成的法家。尼克松将道德上居中立的决断力列为领导人素质之一⁴⁴⁾，而作为富国强兵的功利目标的实现手段，秦始皇以来的君主统治术也讲超脱道德的观念、策略。其轴心的法家“三治”——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和慎到的“势治”，作为当今“法治”加“德治”的半边的深层原理依然健在。

《超限战》刊行的 4 分之 1 世纪前，林彪事件后与务实派对立激化的“文革”派在毛泽东认可下展开“批儒研法”。含封建王朝“外儒内法”延续成分的中共“法家社会主义”⁴⁵⁾，充分体现于邓小平的“能抓耗子的就是好猫”和陈云的“鸟笼治理”⁴⁶⁾，及天安门事件的武力镇压和软禁赵紫阳等。对商鞅的壮举和悲剧共鸣的朱镕基⁴⁷⁾之铁腕、刚球，也具有兵家加法家的复合性格，而同以制伏为终极目标的兵、法两家必然都属实用主义。

毛采用的康生主持、张春桥主笔的 9 大政治报告体现了“突出政治”，提出这一口号的林彪翌年庐山会议上与陈伯达携手整张被毛挫败，而二人在政治报告废案中追求的“国富民强”志向又是双方阵营共有。全会开幕前确认基调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北煤南运问题作为燃眉之急被提起，毛说要借用日本占领和国民党统治时代的经验，曾给陈扣上“唯生产力论”帽子的康生当即对“最高指示”附和。⁴⁸⁾在中苏意识形态斗争中与邓同为先锋的此公作为“4 人帮”黑幕应属极左却不乏现实性，符合战争年代任谍报工作头目多年的“黑猫”性质。日本战败前后活跃的“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说中国人做事彻底⁴⁹⁾，而为生存、发展既否定且敢于实践“必要恶”的姿态，也

见于无所不赖、近乎无赖的“超限战”。

作者一面将本·拉登断罪为恐怖份子，同时又对其反美行动起到牵制美国霸权主义的作用给予了一定评价。“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的想法或“鸡鸣狗盗”的故事，都可以帮助理解这种相对论观点。中国人从阴阳相互包含的理念出发，往往在对立之中寻求转换、统一，是非、善恶的判断也非一成不变而多跳跃转圜。中国社会原理的相当部分凝缩于成语之中，古来智慧超越时代和体制的变化成为民族心性根底，而蒙学格言录《名贤集》中收录的“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教给人们文与武并举、仁义处世和无情对敌两立。这一对句本身含有节度和“超限”之对，又教示着“超限”中的节度。

毛 1973 年再用邓作为“军师”引见给政治局、军委而使人大感意外，其实他 6 年前就对王力吐露过因林彪健康欠佳而考虑换邓出马⁵⁰⁾。“文革”高潮中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取代“副统帅”的念头着实离谱，毛的思路非常人能跟上故连亲信都“无人会，登临意”。平定武汉“兵变”后却下令逮捕“功臣”王力并在会上特地宽慰“逆将”陈再道，使他倚重的中央文革小组及林彪都有被戏弄的失落感⁵¹⁾，而在 9 大特意让“右派”坐主席台头排右边的平衡把戏，却由其授意的老帅小组研究国际战略而带来了外交新生面。

提议对美接近的奇想出自诗人元帅陈毅，联系军人作家撰《超限战》颇能启示“逸格”条件。毛在党内唯一与他有私交缘于诗友关系，1965 年夏改陈诗《七律·西行》可谓二者文心交合。其“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翅展，哪得鸟途通。”⁵²⁾换一角度玩味，不妨释作政治观念加宇宙情思冲破意识牢笼及国际包围。当初以外行、粗人为由固辞接周恩来外长职的陈恰恰以激情和豪胆，想出了知雄守雌、稳健中庸的外交大师周慑于政治顾虑而难道的绝招，其痛快有如《超限战》结语提及的亚历山大立斩“戈尔迪之结”⁵³⁾。

陈的“超限”也见于硬顶红卫兵说“头可断，血可流，领导权绝不丢”，及现编《毛主席语录》271 页（原仅 270 页）“陈毅是个好同志”作护身符。开“红宝书”玩笑搬尚方宝剑之妄为近乎无赖⁵⁴⁾，然而正是毛极力鼓吹“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潮流”。大老粗出身的李瑞环和老将刘华清关于不惜体面、家当搞宇航的决意，祖型即来自陈老总的“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中共爱用的“搞”在台湾被蔑为不雅而“当裤子”更粗鲁，但毛《鸟儿问答》的“不须放屁”到了与讽刺对象——赫鲁晓夫比丑的泼皮地步。

赫公对尼克松攻击美国国会决议臭不可闻如马尿，尼氏想起幼时见闻而反唇相讥称猪尿更臭。⁵⁵⁾田中角荣热中于“金权政治”也因自觉从小跟牛马尿打交道白手起家不易⁵⁶⁾，而毛离人世前不久的美、日首脑因丑闻身败名裂，抹消不掉对中接近等促进和平、繁荣的历史功绩。邓的“死猪不怕开水烫”也不免被归入“痞子”系列，但毛为湖南农民运动辩护时断言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他 81 岁在长沙与周最终议事时卖弄的“politics”本质相通。此词的政治、政策、策略、谋略等多意，正符以政策和策略为中共生命的这位谋略家之见，而与 polite（有礼；优雅）的形似实非又暗合革命不容文质彬彬、雅致说。

孔子的“政者正也”在王道理想反面也提示了霸道机关：“正”右边部首是象征鞭的“反文”亦构成“攻、整”。“politics 强”字面的以强为贵显示强人、强权政治指向，因人才难得而借难同心同德者之手的不论清浊也是政治之本性。邓的“黑猫、白猫”论便是有能即有功的逻辑，而其先驱可举出周的“为革命有时需扮演各种角色，甚至不惜当小老婆、婊子”⁵⁷⁾。邓为再起向毛立誓永不翻案、给华国锋写效忠信三呼万岁，1936 年中央批准 61 名骨干办自新手续换取国民党释放参加抗战，都是愤发图强的马基雅维里式招数。

毛泽东时代对朝鲜战争、金门战役中被俘官兵开除党籍、军籍⁵⁸⁾，而中国“武神”关羽曾委曲求全勉从曹操。曹操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两面性也见于对他备加推崇⁵⁹⁾的毛，“刘备捧阿斗——收买人心”的歇后语显示了中国人对英雄人物复杂性格的谅解。周恩来因“文革”中诸多违心言行后被知识界批为“风派”、“伪君子”，但正如邓小平所说非如此则不能保护他自己及一大批人⁶⁰⁾。“甘当小老婆、婊子”出于 1927 年“马日事变”时顾虑统战关系的忍让，而“笑贫不笑娼”的俗谚可用来肯定这一丑话中的真理。

“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天下无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今古无完人。”这幅民间对联道出的双重标准之有效由“61 人叛徒集团”的解脱⁶¹⁾亦可证实，周的不妨扮演不光彩角色论前提也是为革命。邓的上述辩护再次显现了中共领导人对保全实力、骨干的高度重视，叶飞早年为冲破国民党军封锁线而扮新媳坐花轿⁶²⁾也是慌不择形的“穷则思变”。反观内江剪除王伦坐上梁山泊头把交椅的宋江“黑猫”色彩亦浓：他妒意大发杀妾下狱后醉题反诗构成死罪，为蒙混过关竟至斯文扫地在屎尿里打滚佯疯。

中共征服大陆多靠“毛泽东用兵如神，周恩来用谋如神”⁶³⁾，而二者军事、情报工作指挥艺术真髓源于古典。毛南征北战中最终留在手头的少数书籍中有《三国演义》和《十八史略》，建国后其内政、外交不少是由此智术权谋花样翻新。他 1963 年临古稀之际为测试反应而在苏联大使面前做垂死表演⁶⁴⁾，叶剑英也曾为挡王洪文驾而仿司马懿装重病骗敌手的把戏⁶⁵⁾。叶 76 年春失势后为窥测时机、东山再起而隐居西山时，所携并勤读的智囊便包括《周易外传》、《鬼谷子》、《战国策》、《诸葛忠武侯兵法》和《三国演义》。⁶⁶⁾

毛连旧友斯诺都疑作与中央情报局有瓜葛而反加利用向美方传递信息⁶⁷⁾，令人想起周瑜下书赚蒋干等首领自编自演诈谋的典故。毛舍弃“四个伟大”中“领袖、统帅、舵手”而只认可“导师”，邓亦欣然接受“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美誉，而汉语“设计”的做圈套之意能作政治、军事、外交上马基雅维里主义脚注。《超限战》的危言大计沿“兵者诡道”传统而成，江泽民时代为政治设计甚至倾听陈伯达、王力进言，如王提议为不让民进党得势而适当让步以加快国共谈判步伐⁶⁸⁾。其广开言路比毛存心不启封退回陈 9 大政治报告草案的促狭⁶⁹⁾高明，邪恶轴心“死老虎”的“第三只眼”在此显出无用之大用。

《国际歌》旧译“起来，全世界的罪人！”、“不要说我们一钱不值”⁷⁰⁾，勾勒出革命、建设初级阶段常见的“穷极无赖”倾向。面临苏联外科手术式战术核袭击危机时毛被迫破格起用将才，

不顾康生以抵触党纪军规为由的异议而批准因腐化错误被开除党籍的两头“猛兽”老将出笼。⁷¹⁾推荐者许世友立遗嘱“活着尽忠，死后尽孝”而要与母合墓土葬，政治局内响当当的忠毛“铁杆”公然抗拒毛发起的高干死后火化倡议，邓不得不以“下不为例”的“两制”了结⁷²⁾，而冷战后外交新思考的“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方向与之一致。

胡锦涛 2001 年访“无赖国家”伊朗、叙利亚，05 年涉足拉美、东南亚展开资源外交，都是不计黑白、亲疏的以走边锋谋远利之举。田中角荣在钓鱼台宾馆惊奇地发现主人投其所好预备了台湾产香蕉⁷³⁾，中共俘获孙殿英后从香港重金购鸦片供过瘾，使曾令盗掘清东陵的“邪将”感呼“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此类超限竭诚的收买人心联系周瑜赚蒋干之“赚”的获利意味，使人悟到貌似法无定法的中国式马基雅维里主义本质在商鞅或商朝之“商”，而招来“中国是当今最高的资本主义”惊叹⁷⁴⁾的“十亿人民九亿商”非今日始。

抗战胜利后朝野各方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共建国后发挥陪衬、辅佐作用，这一政治设计机构名称中的“协商”和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凸现了与“匠人国家”日本形成对照的“商人国家”性质⁷⁵⁾。毛泽东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和孙文的“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证券及担保”⁷⁶⁾，在人本主义、心本意识原理的比喻中吐露了资本主义的骨子。战国策士张仪游说被打伤但知舌在就安心道足矣，《超限战》的搭国际快车、炒时代新论亦属学商复合的“知本主义”大腕，而“无商不奸”的偏见歪打正着地与兵家诡道相符。

《超限战》称未来战争主角非铁打硬汉而是白面书生，其实梁山泊 108 将头 4 名也基本为文攻型。“入云龙”公孙胜紧接“智多星”吴用之后排第 4，不无几分与《超限战》玄妙计略相通，9 大政治局常委（毛、林、周、陈伯达、康生）也多半是文职而往年谍报头子占 4 成。毛推举的三打祝家庄也属情报工作奏效的战例，而《水浒》从间谍到伪造文件、打劫等“第二战场”行行有状元。“9. 11”恐怖袭击后中国媒体称道撞击角度完美而引起反感⁷⁷⁾，但无论是瞧热闹或看门道都和《超限战》一样具《水浒》的冷眼加热风。

5. 中国军事新思考反映出与首强美国的共通，预示着美中较量将成为世界史新热点。

《超限战》出版后不久译文即出现在美国国务院的办公桌上，美国海军大学、西点军校也向作者表达了用作教材、参考的意向。作者对他们在“9. 11”暴露的理解不足感到遗憾之余，又反过来称许当初兴趣的反应迅速。⁷⁸⁾美方高层的敏感吸取显示了中、美有共鸣基础，本书又反映了两国的诸多共通点，如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强烈意志；大国的自负和对人类做应有贡献的责任感；全球性眼光和整体历史意识，及产生新观念的大胆、灵活的想像力；与战败国日本、德国形成对照的极度重视国防；不同于苏联军备扩张之无谋的重视费效比的经济观念、实用主义；将意欲、方策付诸实现的精神、物质力量。

序论末尾特标明“时值海湾战争爆发 8 周年”的此书，总体倾向和根本动机中明显可见对化为“国际标准”的美国军事理论的扬弃和挑战。作者着眼于海湾战争后美国全无军事胜利的事实，

指出军事手段对解决复杂化的政治、外交、文化、民族、宗教等问题作用有限,预言将发生由更复杂、广泛、隐蔽、微妙的政治、经济、技术的暴力进行的非典型性战争。其“准战争、类战争、亚战争”的例证,是索罗斯对东南亚的金融攻击、本·拉登对美国驻外使馆的恐怖袭击、奥姆真理教的地铁散布沙林、莫里斯等在因特网上的捣乱。

作者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以天下为己任”妄想表示反感,同时又欣赏其进步、合理的一面。比其武器性能进化更赞叹武器性质“慈化”,较之精密战更评价维和、缉毒、平暴、军援、军控、救灾、撤侨、反恐等非战争军事性行动,使人感到对内的“超限”志向,即突破闭关自守的毛泽东时代的桎梏,及在改革开放与守旧排他之间摇摆的邓小平时代的局限,百无禁忌地引进硬科技和软文化等当代文明最尖端,以加强安全保障和综合国力。

《超限战》新思考诞生的最大动因和背景,是海湾战争的冲击和美国的“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的战争”的国际标准化。受对抗独一无二、说一不二的超级大国的意欲和焦躁所驱使,基于无条件肯定和单纯模仿意味着永远居于亚流的认识,求赶超捷径的理论飞跃便告问世。美国未来社会学者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1980)中宣称,发展中国家在信息革命时代与发达国家同处于一条起跑线上。80年代后期中共高层的急进改革派被这一假说激发了自信,也被国内鼓吹从苍老封闭的黄河文明走向新颖开放的海洋文明的激进论调打动,而《超限战》的想定也部分建筑在类似的基础上。

受“三浪”论鼓舞的赵紫阳及其智囊团,随后在“平定风波”时遭“清场”而空遗“河殇”。但“未完成交响乐”的热情被悲怆压抑不久旋即复活,且是由于对立旋律的“正统”本身即是与“异端”共同构成双声部的一端。军人作家钱钢将唐山大地震放入“历史上的今天”与古今中外诸多悲剧并列⁷⁹⁾,而以这一非线性又似线性的连环为线索反观,则1989年5月20日首都戒严与49.5.19台湾戒严相重合,6月4日“平暴”最后一击与19.6.4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引起全国罢课罢工、28.6.4关东军炸死东北军阀张作霖、60.6.4日本阻止日美安保条约改订全国工学首次统一行动(560万人参加)等惊变、动荡相连。然而84年6月4日邓小平宣布裁军百万人,又埋下了一道亦乱亦治的伏笔。

在京城以实弹扫平学生、百姓障碍的快刀斩乱麻,被千夫指为“杀人如麻的屠夫”的蒋介石也罢,1976年天安门事件时愤令“君子动口也动手”的毛泽东也罢,都是干不出也不敢想。用棍棒杀人和动刀杀人按孟子的逻辑别无二致⁸⁰⁾,但不可否认第2次天安门事件的“跳级”有“无根据的狂热”之异常味道。以“钢铁长城”的全副武装对付手无寸铁的“挡车螳螂”,堪称非对称、非典型的“有硝烟的武卫战”,其破天荒和激起建国以来空前物价飞涨的1988年夏金融动乱恰成一对。邓对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长吴振宇大将称物价体系改革是“过五关斩六将”⁸¹⁾,而群众负荷能力超出想定招来了失败。朝鲜2世领袖于2002年7月1日发动类似尝试后,同样导致了年率2成以上的超高通货膨胀。

时期、途径、速度不同地迈向“强盛大国”的两国,在此又显出同根及理想、现实的双向:

一面心比天高而欲与天公试比高，一边又心中有数知不能一步登天。毛曾拿林彪的干瘦为例说一口吃不成胖子，而还未到要以钱买老来瘦境地却要重量级拳手较量的中、朝，不得不因势利导以技法计谋来藏拙补强。中国“两弹一星”研制的突飞猛进是打破常规、走自己道路的成功，而站到巨人肩膀上的借力节力是落后促使的超前超常。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邓也按存在决定意识的法则，对政治、经济、军事的“虚胖”早有清醒估计。1975年初出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伊始喝破军队臃肿⁸²⁾，便是谋求精干实力的步骤之一。

邓“文革”后再起即推行改革开放，紧接着的中美建交和访美成为保“球籍”新起点，他在休斯敦宇航中心感叹美国先进而再燃中国高科技化之火。其10年前美国宇航船登月时中、朝、越、古巴封锁了消息，而在邓访美归来就发动的对越作战中，据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员江奇涛（1954—）的《雷场上的相思树》（1985）造型，上战场的军校学员已有背诵美国宇航员语录、仿美式说法称敌手为“共产党国家”之辈。出自和乔良同闯红军长征路的作者的该小说，由获全国中篇优秀奖及解放军文艺奖可反映时代精神。共产党中国“而立”之年的上述变化可谓“和平演进”⁸³⁾的胎动，而建国10、20、30、40周年时的中苏决裂、中苏交战、中苏盟约失效、中苏和解，显示国家进程如人生成长、流逝。《超限战》出台的“知天命”之年的中国，则已将“志于学”的建国15周年前后的策定四化、跻身“核俱乐部”的腾飞，推向了凌驾于同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滑坡不止的苏俄的水准。

靠西医治愈牙病后欢呼“英美派胜利了”⁸⁴⁾的毛晚年勤学英语，他在中苏蜜月时代都不顾全国热潮而拒习俄语，和50年代提出的“赶英超美”即“维持球籍”相联不妨释为眼中无苏。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平分秋色、在中苏对抗中不向霸王让寸分，使中国在冷战后的政治多极化新格局中持信心、恒心。“苏东波”和美国独赢使“6.4”后陷入国际孤立的中国大感震惊和压力，但海湾战争爆发1周年之日邓小平踏上南巡征程就是化危机为机会的转机。1992年1月还是“863计划”载人飞船研制工程上马的起点，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军事先锐化又构成增强政治大国资本的有力途径。“神舟”宇航船将苏制“联盟号”脱胎换骨，象征着与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相仿的“脱东入西”走向“归根入世”。

拍板研制载人飞船时李瑞环称即使不申办奥运会也要搞，刘华清主张不惜动用国库老底的金子，而顶层的共识是通过高科技国防实力威震世界、凝聚民心。⁸⁵⁾鸦片战争前英国得到的“世界工厂”牌子挂到中国头上后，恐美、崇美情结进一步升华为与美分庭抗礼的竞争意识和敌忾心。1992年14大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会成为有军人席位的最后一届，唯一的军方代表为前海军司令刘华清则颇具深意。邓指示不得因赵紫阳下台而改动13大的优先发展经济路线，而赵欣赏却受正统派狠批的电视政论片《河殇》（1988）的汇入海洋文明志向，也在据说晚于郑和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500周年之际海军势力抬头而明显化。

冲破黄河文明局限、恢复海洋国家荣光的意向建国伊始便有，江青为不受帝国主义欺负而欲叫女儿学船舶⁸⁶⁾，就符合其黄河入海流省份故乡的受难史。胡锦涛报考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从

事刘家峡水电站建设，作为生产能量兼治理黄河、赶超以退还庚子赔款建清华前身的美国的举动也富于时代精神。李讷因体弱最终与其姐一样专攻文史，和同毕业于文科最高学府的林彪女儿“文革”初又都曾司军队“喉舌”。二者分任《解放军报》总编和《空军报》副总编，而主管后者的空军政治部正是《超限战》第一作者的笔杆子所属。

林彪“文革”中说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都要靠笔杆子、枪杆子，“两杆子”的文前武后顺序或有逢迎“宫廷派”的味道，但包括军事独裁政权在内古来尊文高于尚武的中国传统，在从不亲自动枪的蒋、毛、邓先后君临的20世纪亦得到继承。建国后空军初组6所航校时毛批示政委必挑最佳者，要求各野战军提出3倍推荐名单供军委选定。其军史上少见的点将法⁸⁷⁾也是空军得天独厚的明证，而跃居这支“天骄”的政工部门顶层的特殊人物刘亚洲，也在公开于网络的议国策、论兵法中展示了以笔为枪、运筹帷幄的专长。

照孙子“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之说来判断，《超限战》和《大国策》也许应视为试探气球。但考虑到中共先行务虚、带动务实的工作方法，就又不排除类似毛泽东赞扬长征的是宣传队、宣言书、播种机，或毛在首次全国性“文字狱”——“反右斗争”中发明的莫谓言之不预的“阳谋”。“军中无戏言”的规矩令人想到1976年天安门祭周义士的“扬眉剑出鞘”，而空军的超前“越位”吻合林彪等中共将帅辈出的湖北的“九头鸟”气质。湖北佬李先念的称龙快婿也将“第三只眼”凝视台湾海峡，而空军和海军、战略导弹部队与陆军在同一起跑线上并肩，正因拿下这一头号军事目标需威慑或攻略的联战。

强攻金门的败将叶飞由邓旨意任海军司令(1980—82)，给该军种重埋下报一箭之仇的卧薪尝胆念头。叶悟到的胜机关键——制空权随半世纪的努力而大有改进，空军“雄鸡高唱”作为载人宇航凯歌高奏的前奏便是自信的表现。《超限战》萌芽时解放军射向台湾的导弹不似天安门平定波乱是实弹，上述两地3将校的战国策想定也不免被以“会咬的狗不叫”的逻辑看轻，但刘亚洲的诸多惊人之语份量不如在《金门战役检讨》中披露的江泽民“台海必有一战”。在《反国家分裂法》出台后不久爆发的涉日示威中，激进的忧国之士在网络上发出了“中日必有一战”的狮子吼。连同世纪之交军事领域发生的局部流血摩擦带来的“中美或有一战”疑问，世人不能不关心十年磨一剑后是否行将开刃、刺破青天。

二、中国防止出格走火的保险装置、缓解波乱风险的隔离屏障

中国因巨大和复杂使外部世界的认识往往流于浅层，而在此主题上决定事物的关键内因是党、军及国、民的行动文法。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战争是试图最终解决政治、经济冲突的非常途径，推想战争之难于预报台风是因人心不易把握超过风云不测。板块压力倾轧引起的地震由于面积广、位置深、时间久而几乎无法估摸，战争则因利害对立、力量对比及意志情绪的盘根错节、瞬息万变而难料。然而“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等格言或地震云等迹象的灵验，引导人们以“空

234 (234)

气、常识之研究”⁸⁸⁾去解剖社会准则和民族气质。

“文革”之初举《辨奸论》大讲政变经的林彪恰恰是暗思政变的阴谋家，作为历史的讽刺提醒着辨本清源重于辨证施治。最近世论频繁提到的地缘政治紧张也需追溯到史缘、人缘，“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助于理解人之和及人之总和的社会的重要。“三才”中人在天地之间又高于天地之上，“石破天惊逗秋雨”上句“女娲采石补天处”由来的共工怒触不周山故事，就在象征着女娲所造的中国人之多难宿命的同时，以“天柱折，地维绝”而“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结局，展示了人事对天运、地势的深刻影响。

《淮南子·天文训》这节中的“天柱、地维”指古人设想天圆地方，认为天有9根柱子支撑、地有4条大绳系缀。在当代维护地区、地球安全时仍需要“天欲堕，赖以拄其间”⁸⁹⁾的稳定、缓冲装置，而 hedge fund（对冲基金）的词源——risk hedge（回避风险）的 hedge，由原意“篱笆”牵出“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的警句。毛在苏联国庆40周年庆典上引俚语“一个篱笆三个桩（柱），一个好汉十个帮”⁹⁰⁾，也含鼎立合伙降低风险之意。中国的战与和的概率以此譬喻来看，便是安全阀能否抵御、化解爆发抗争的因素。

本文将《超限战》作为解析中国军事新思考、时代精神的楔子、引子，而围绕该奇想的上述思索意在获取探索更宏观的课题的线索。以下便结合《超限战》的启示和笔者的心得，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国民性等多角度，将中国的安、危两面的内因机制加以概略的整理和宽泛的展开。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尽可能追求客观，同时按中国式对立、统一思想的模式将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关对等列举。为表现“自制力能>失控可能”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基本认识，且将理论上比重相等的阴暗面置于光明面后。

得以防止中国的军事霸权大国化和军事冒险的安全阀，主要可举出以下几条：

1. 根深蒂固的儒教道德律及大国矜持使国家铤而走险的可能性低。

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并非“口头革命派”，其根源来自尊崇王道、避舍霸道的传统。古来的“礼义之邦”和“正义之师”的理想，在中共的国家和军队也得到继承。“师出有名”的固定观念，成为阻止发动不义之战的抑制力量。毛泽东为牵制林彪的政治野心，提倡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鬼计。与那个时代党、国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形成对照，对外活动中不愿脏手的王者风度鲜明。其表现之一是，中共一方面早于国民党建立特务机构并大力开展谍报工作至今，同时建国伊始便严禁暗杀和美人计、金钱收买、手枪恐吓。⁹¹⁾

日本在军国主义时代犯下不少败坏声誉的对外恐怖活动，如关东军在沈阳炸死张作霖（1928），驻朝公使唆使当地政变集团杀害王妃闵妃（1895），担任警备的巡查刺伤作为国宾访日的俄国皇太子（1891）。蒋介石当局特工到河内追杀汉奸汪精卫（1938），在香港往周恩来预乘的英国客机上安定时炸弹造成多名随员死亡（1955），在刘少奇访问东南亚期间伺机暗算（1963），⁹²⁾却几乎没有在海外以外国人为目标的恐怖活动。中共的对敌暗杀也仅限于夺取政权前的国内，建国后则贯彻了高

于国民党时代的注重国格的节制。

蒋、毛放弃对日索赔战争损失引起受害者抱怨和“软弱外交”批判，但蒋的“与人为善”、“不记前嫌”⁹³⁾论据及毛、周坚持器量不能比蒋小的高姿态⁹⁴⁾，作为大道理当时得到了国民普遍接受。具儒者风格的胡、温体制起步时，宣传机构强调了“大国、大党”的自负⁹⁵⁾，可以想见中国将更以堂堂大人的资质争取真正成为负责任、有品格的泱泱大国。

中共建国后破例发动的对印度、越南“自卫反击战”(1962、79)，都在深入对方境内攻克要地后主动撤退，既惩罚了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和显示了震慑威力，又表达了本无称霸境外的野心。周恩来为维护印度官兵体面想出让对方投降时打绿旗而非白旗，对越作战中部队压抑仇恨情绪秋毫无犯也传为佳话，而保持光荣传统的意念今后无疑仍会发挥束缚力。自诩为世界之首的“禁恐文明先进国”牌号⁹⁶⁾，同样维持越久就越不至于随意抛弃。

克林顿总统 1998 年决定改变美国 22 年前禁止在海外暗杀的命令，对策划多次爆破美驻非使馆的本·拉登如拘捕引渡不成则可暗杀。⁹⁷⁾ 被解释为自卫需要的该修正反衬出 76 年为止的无法无天，而英国谍报机关 96 年仍锲而不舍地组织暗杀卡扎菲⁹⁸⁾。98 年执笔的《超限战》动口不动手地提及斩敌首之“禁招”，可从国际反恐斗争非常化动向中找到合理解释，但 19、20 世纪分别称霸世界的英美为侵伊捏造证据的无赖行径难现于中国。

周恩来曾指挥“打狗队”毫不留情地处死叛徒顾顺章家小⁹⁹⁾，但否决过顾为灭敌要员炸饭店大楼的方案¹⁰⁰⁾。解放上海前地下党爆破军火仓库时亦投鼠忌器避开居民区¹⁰¹⁾，周 1972 年称不愿看到台湾成为血海¹⁰²⁾可释为类似动机。林彪出逃飞近中蒙边境时有可能用导弹打下，但周以不可对副主席动手及自己无军权为由而止于呼唤回头。他事后坦白当时顾虑难于向党、军、人民交代，其选择及说明得到认同¹⁰³⁾体现出名教观念深广。毛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据叶剑英称也是因为拦截或击落就解释不清。¹⁰⁴⁾

蒋介石“中山舰事变”(1926)时仍不忘找公章办手续¹⁰⁵⁾，也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古训使然。超越时代、体制的中国社会指导原理可归结为“理、礼、力、利”¹⁰⁶⁾，而由“先义后利”、“先礼后兵”等规戒即可看出价值取向。“名利双收”的语序提示了名高于利的硬道理，“身败名裂”则证实了古来“亡名(名籍)=亡命”的等式。毛、周均酷爱的辛弃疾词¹⁰⁷⁾中的“赢得生前身后名”，及毛自我欣赏的个人崇拜颂歌《浏阳河》的老版词“世界把名扬”¹⁰⁸⁾，便是中国人及中国所追求名声之终极目标。

周的上述两种顾忌的深层心理，不外乎是避免与人民为敌、害怕受历史审判。据传“6.4”镇压者中不乏后悔而要求抹消该段“荣誉”，当事高层人物亦以种种方式竭力洗刷干系¹⁰⁹⁾，可见触犯天下之大不韪而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下场何等可怕。由此还悟出急功近利的危险和笑到最后者为俏的规则，及道家“大欲似无欲”、刘少奇“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至理。号称“东方福尔摩斯”的中共谍报专家抗战合作时期大胆赚取国民党情报，而狡诈残忍的谍报首脑康生斥为战术胜利、战略失败¹¹⁰⁾，就是不因小失大的政治头脑。

毛对义士行刺汪精卫不以为然是因个人、小集团力量不够推翻罪恶制度¹¹¹⁾，他逗基辛格说你不妨把公文包放在哪里试看我们去偷它不¹¹²⁾。中共在野时谍报工作偷、骗、诱，抢无“邪”不用，而当政后尽管对内统治多肆无忌惮（如禁止党内侦听而对党员、国民乃至高干的侦控屡见不鲜¹¹³⁾），对外也按友好归友好、谍报归谍报的国际常识为国家利益而侦听、破译不误¹¹⁴⁾，但不像苏联克格勃、美国中央情报局那样明火执仗或鬼鬼祟祟，更不用说韩、朝到日本绑架政敌或异邦国民、引爆敌国客机以至第三国圣地的海盗行径¹¹⁵⁾。

1986年首任日本内阁安全保障室长的佐々淳行，曾借鉴英国以中国“杀鸡吓猴”法镇压香港暴乱的经验¹¹⁶⁾，指挥了平息东京大学左翼学生造反（1969）、攻克联合赤军挟人质占别墅（1972）。这位治安大家对中共的理解不止于亲身实践的“牛刀杀鸡”，也包括在日谍报的放长线钓大鱼。他指出中国人不去撬保险柜盗窃机密，而是拉拢政权中枢关键人物使其化作情报源。超越“下忍”（低级“忍者”[间谍]）的这类“上忍”（高级间谍）¹¹⁷⁾，有小不忍则乱大谋而为大动作舍弃小动作的成份，也符合“攻城者下，攻心者上，不战而降人，上之上也”的孙子标准，而回避外犯大忌正是维护国家利益、形象的大计。

2. 改革开放时代的“政治文明”（民主化）进展带来“慈化”（人道化）。

林彪父子给毛泽东起“B-52”译名，是把他对政敌的无情肃清比作重磅炸弹的狂滥攻击。毛自我剖析的“虎气”（霸气）加“猴气”（淘气）¹¹⁸⁾，在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中招致了无数生灵涂炭。邓小平全面、彻底否定“文革”的背景之一，就是本人遭迫害、长子被逼致残的受难体验。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未解职情况下被非法关押、冤死狱中，毛批“刀下留人”否决了林彪正式动议判刘夫人王光美极刑¹¹⁹⁾，毛远新却不顾“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原则批准枪决谴责“文革”的党员张志新。张饱受狱吏轮奸¹²⁰⁾并在行刑前被切断喉管以防喊“反动口号”，其日恰逢蒋介石去世前夜而其时大陆专制已酷烈于蒋政权之上。

中共在野时即有“肃反”、“整风”等枉杀，其根源与集中兵力歼敌的“牛刀宰鸡”都出于如临大敌的紧张，而终沦到非难敌方的“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程度。图节约子弹、铜板而用刺刀捅“内奸”阴户处死¹²¹⁾，为斩尽杀绝而把地主家婴儿扯腿劈成两半¹²²⁾，这类疯狂又在“文革”初北京大兴、广西的灭门、食人等惨案中冒出¹²³⁾。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在量、质两面都不亚于纳粹德国残害犹太人，因而被国际社会视为与朝鲜等同类的野蛮。其结果促进了对“政治私刑、死刑”痛定思痛地反省，不伴随法律责任的卸任逐渐以调动、辞职等稳妥形式为主，执行死刑也引进了美国、新加坡等少数先进国家的注射方法，废止了旨在杀一警百当众处决的旧习及要家属付弹药费的荒唐做法¹²⁴⁾。

建国后独裁化的最初表现是领导集团内的肃清和党内的言论镇压，参与了这一系列政治斗争的邓小平，在1989年解除赵紫阳职务、镇压民主化运动中显出与毛同根的性质，出动坦克和排枪乱扫甚至有倒行逆施的印象。1979年制定的《刑法》中“严禁聚众‘打砸抢’”可窥见其惊

恐失措心理，而政治局解除赵紫阳职务尽管是“八老”导演的产物，但电视上议决亮相毕竟比以“生活会”拉胡耀邦下马的胡来强。江泽民时代开始反省由军队进行武力镇压，言论的自由度也有所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非正常下台，基本上只限于受法律制裁的渎职事件（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对前总书记的行动限制至死未全得宽松，与张学良生前获自由比明显逊色，但无可否认渐进式的前进。江泽民的禅让虽不彻底地分成两步，但党、国史上空前的和平交班历史意义无可估量。

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称颂蒋经国向李登辉的交班为和平过渡的奇迹，而既未响枪又无阴谋的安稳转换¹²⁵⁾在2004年台湾大选中被诡秘的枪击打破。选举政治色彩同样浓厚的日本也动辄嫌中国政治停滞于专制时代，但自身的封建气息所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已暴露无疑。00年小渊首相倒于脑梗塞后自民党主要头目密议选定后任，官房长官捏造小渊“万事拜托”云云¹²⁶⁾，比毛“钦定”华国锋和“你办事，我放心”有过之而无不及。毛借用林彪发动“文革”实质是军事政变¹²⁷⁾，而江交出军委主席头衔可谓千禧新纪元标志。

江在内外无形压力下自动退场标志着中国历史更上正道，而长年被认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进化到大量否决票当场在电光板上显示是其伏笔。中国不像戈尔巴乔夫大声疾呼“改革、透明度”却不了了之而寿终正寝，而是以涓涓细流徐徐地积聚起小河、大川。民意反映度的上升当然和民度（民众素质）的提高一样尚处于初级阶段，人权思想、民主意识的普及也还是任重道远，但胡温政权的“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弘扬了儒教“以民为天”的王道。2004年南非发生多起华人遭劫遇害时外交部长特别代表前去处理交涉，其打破建国以来不为具体案件派特使惯例的做法也是划时代的象征。

胡锦涛言“尽管中国有13亿人口，但我们珍视每一个同胞的生命”¹²⁸⁾，使高挂中南海新华门上的毛泽东手书“为人民服务”复具现实性和说服力，意味着回归现代革命起点的孙文三民（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动辄称打仗死上亿国民也无所谓的毛已倒退至秦始皇的原始层次，而领导人共有视人命关天的民众感情是长足的回升。尊重人命的意识日益显著地得到渗透和接受，后邓小平时代在这方面趋于成熟的一例是，民航遭劫机时不再强求制伏歹徒而首先确保乘客安全。这一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方针转换摆脱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固定观念，诀别了往昔的暴力、斗争万能论，堪称纠正偏激的新型革命。

天安门事件后的“慈化”、“政治文明”受日本和亚洲“4小龙”影响大，继邓小平时代兴起“儒商”理想，江泽民提倡“德治”和“弘扬中华文化”，其中可看到“儒教圈繁荣”论的投影。日本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头号榜样，台湾作为中共的双胞胎式竞争对手，其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成功尤富启示。台湾1987年终结持续38年的戒严令、告别军事独裁的契机之一，正是4年前情报局和黑社会联手在美暗杀反体制作家江南引起谴责。

中共2年后首次发布戒严令并血洗了“反革命暴乱”，而激怒内外的昂贵代价同样促进了“上善若水”的新感觉渗透。据报李瑞环忏悔当年不知可用橡皮子弹而开枪铸成大错¹²⁹⁾，给党、军遗

238 (238)

下的精神创伤有望至少 1 世代（20 年）不敢再出此下策。地处政治、文化中心——京津地区的 38 军、28 军对 1989 年学潮、民潮的同情，引出了关键时刻越是京畿部队越不能用的惊呼¹³⁰⁾，而受首都人政治头脑的影响也意味着被世界高文明感染。

和台湾进行和平竞争的新势头，与其说是冷战思考的鼻祖——杜勒斯国务卿预言的中共第 3、4 代的和平演变，不如说是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明治时代企业家涩泽荣一所谓“《论语》加算盘”的双管齐下。美军越战中由福特汽车公司总裁麦克纳马拉挂帅，新近限定杀伤精密武器的“慈化”根底也有追求费效比的打算，中共建国以来第 3、4 代领导集团的内政、外交新思考，也建立在避免无益的消耗和摩擦、重视建设性和效益的基轴上。

开国世代领导人多勇猛泼辣的两湖、川人，邓小平时代顶层中江南、华南人比重上升，经江泽民时代的“脱辣”后现政治局常委基本是东部近海地区出身¹³¹⁾。清一色专攻理工科的该能吏集团由此不难想见忌避对内争外斗的“钢铁公司”¹³²⁾，而中央委员会中江浙人比例突出¹³³⁾及苏州可能成为第 5 代中坚的摇篮¹³⁴⁾，与烈酒人气衰、茅台趋淡化相符。

另一重要基因是以共青团中央为根基者的“和平鸽”志向：胡耀邦在与浏阳同乡王震的政治分歧中表现出“湖南骡子”的火爆¹³⁵⁾，但受中央委托在布加勒斯特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公布朝鲜停战受到长时间热烈鼓掌，给他及后辈种下了和平可贵受尊的浓厚意识¹³⁶⁾。赵紫阳同以殉道而终无河南人倔强的缘故，其政治开明也与深知外面世界真精彩有关。

80 年代的“白天学老邓（小平），晚上听小邓（丽君）”显露出脱意识形态倾向，1982 年 25 岁的大尉憧憬邓丽君而驾机经韩叛逃台湾说明港台之风之强。2000 年“中华民国总统”就任式上唱“国歌”的张惠妹一度被抵制后又受到大陆欢迎，表现出向往高文明的潮流不可阻挡。想起满族征服全中国而又被汉族文化同化，则礼乐方面的这类演化就颇有深意。

周恩来以释放战俘从美国交换回的物理学家钱学森成了核弹研制元勋，他 80 年代问热中政治、后卷入天安门事件被捕的作家戴晴最爱贝多芬哪首交响乐，听是《命运》便说表现人类和谐友爱理想的《合唱》才属最上乘¹³⁷⁾。中共从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初级阶段到小康社会，也经历了《英雄》式奋争→《命运》式动荡→《合唱》式协和的境界升华。

3. 使军队的擅自妄为近乎不能的统治体制和防其自我爆炸的“紧箍咒”。

海外盛行的“改革派对保守派”、“××帮对××帮”等单纯划线，无法把握中国的“复杂系”。以胡锦涛为首的政治局常委会为例，因中国人的自我中心所致的对他人的多元、多变，及务实志向的增强和争权欲望的淡薄，全员可视为透明无色或中间色的能吏群体。党内有派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而富国强兵的目标和追求国益的姿态为举党、举国一致。

邓小平 1984 年对港澳记者团申明，关于向香港派驻军问题的黄华、耿飚发言不代表中央，只有自己和赵紫阳总理等数人的见解才算正式。将元外长、国防部长点名斥为“胡说八道”被看作“皇帝”派头，但又由此可见理外之理：由于中共“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

中央”的原则，及外交、国防领域的彻底的高度集权化，在党的路线和国是、外交及军事的战略和重大决策上，难以出现明显的不协调音。马立诚因“对日外交新思考”引起轩然大波而被迫辞职赴香港定居后，惹祸的《战略与管理》2004年又因登经济学者痛批朝鲜论文而遭查封，数十年一贯的外交舆论一律虽不民主但能对外避乱。

关于外交、军事领域“鹰派”对“鸽派”之说，也有简单化和片面性之嫌。正像政治、经济上变幻自在的“放→收”交替操作所示，中共领导集团具有按实情、分时期调节态势的灵活性。即就台湾问题而言，最终期望统一、不排除武力解决的统一意志共有，使全员皆可归于“鹰派”，而相异之处仅在于注重整体、长远的“鹰眼”和侧重局部、当前的“蚊目”的比重，或“鹰击长空”和“鱼翔潜底”、“文火文攻”和“武打武开”的手法选择。

将中共领导核心和“军部”对立的单纯两分欠妥，因党指挥枪的铁则在建国乃至建军以来都未曾动摇。即使在军事独裁色彩浓烈的时代，毛的党主席地位也高于兼任的军委主席。邓、江专任军委主席被非议为垂帘听政，但对党务、政务的干预并非动用“统帅”头衔，而是以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或前总书记等党元老的特殊身份。以有色眼镜认定军队即带冒险欲望的战争机器或军部是为追逐名利而欢迎战争的势力，就不免看错实情和本质。

邓为强化江体制而将杨尚昆、白冰兄弟置于军委中枢，随后又警惕形成新军阀而收回“杨家将”实权。在文官统治体系确立的今天，军队长老随着建国世代干部的退休而难以干涉。毛断言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也因为实际感受的淡化，无法再用作军事独裁或军队优先的根据。胡时代的国防部长曹刚川在朝鲜停战后1955年入伍，与塔山阻击战功臣出身的前任——张万年之间有巨大“代沟”。由红军方面军、解放军野战军等而来的军内派系，在邓时代尚相当牢固、鲜明而在江时代趋于松散、模糊，有利于军队的健全化。

国防部和全军各总部均受中央军委支配，然而中共军又和党、国一样远非外界以为的铁板一块。军种、兵种、军区之间以至各自内部即不乏相互牵制，如1967年武汉军区独立师支持抵制“文革”的军区司令陈再道，遭到忠于毛、林的驻武汉空降军严阵以待监视和东海舰队兵临城下警告；“9.13”时中央不顾空军的抵触情绪，派陆军控制机场、基地以防乱¹³⁸⁾；“四人帮”拉拢了南京军区司令丁盛，却因该军区部队多在前任许世友影响下而调不动¹³⁹⁾。再加上军事指挥官加政治委员的双重权力结构，毛泽东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分而治之驾驭术，使军队难以产生在上层、大范围内全面作乱的苗头。

主张军队脱离党领导的中立型“国军”化的议论受到了压制，然而军队介入政治的意志和发言权、影响力历来不大。“文革”前期国务院部委受军管小组领导，地区负责人也多由驻军首长兼任，林彪倒台和文官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后战时体制得以解除。1969年党代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由于林彪权势扩大和中苏武力冲突的背景使军人比例异样高，而1985—92年、98年至今政治局常委中已无军人。即便是“文革”期间在政治局内占一席位的解放军总参谋长，如许世友上将所道破的看似武将其其实多带文官性质¹⁴⁰⁾。

建党后 68 年间历代总书记无例外地倒台于“路线斗争”，毛泽东时代军队总长、代总长也相继被撤职，然而值得注目的是他们都束手就擒、甘受处分。毛在与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冲突时，将总长黄克诚、黄永胜也当作靶子，怀疑搞里通外国的“军事俱乐部”、“带兵造反”，但二者的所谓参与军事政变不过是他猜忌多心。¹⁴¹⁾蒋介石 1955 年整肃前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上将也出于警惕靠拢外国、酝酿兵变，孙的清白和忍从与大陆多位“军头”不谋而合。其如出一辙的轨迹从一个角度启示着，“中国威胁论”相当部分实在是幻影。

建国后军事政变的危机接近于零，除中共极度戒备、严厉防范之外，受古来忠君观念和外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信条束缚，是更深层和更有效的内因。“文革”初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忿恨“上海帮”之余潜入大别山，但这位出身武林、性情火爆的虎将之“打游击”只是牢骚，不久便向毛负荆请罪并无奈演出“将相和”。¹⁴²⁾天安门事件时不赞成武力镇压的某军长，也仅限于称病入院的消极抵抗。逮捕“四人帮”的政变因抬出党中央兼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维持了军队难以单独得到的政权正统性。主要策划者叶剑英忌讳“宫廷政变”恶名坚辞就任领袖¹⁴³⁾，也反映了“文高武低”的传统。复出的代总长杨成武进言连华一锅端遭拒，杨援引刘备托孤“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叶帅却说要学诸葛亮扶阿斗以免日后被说有野心¹⁴⁴⁾，只要孔明人气不衰越顶层就越难有妄举。

张学良软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也没有颠覆政权的意图，毋宁是虽有救国大义却禁不住僭犯的不安。张放蒋回南京时冒受罚风险同行，亦是出于不堪忍受“逆贼”、“叛军”污名的心理。林彪事件中关于合谋暗杀毛泽东的一节疑点甚多¹⁴⁵⁾，且不论没有毛的命令连一个连都调不动¹⁴⁶⁾，及“林副主席第一号战备命令”也因毛的不悦而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单考虑军人对党魁的畏惧就可知真实气息不浓。朝鲜战争一级英雄鲁珉在空军作战部长任上被林立果逼害毛，夫人惧怕杀头而故意把他眼弄红肿，林对此滑头软抗倒也无可奈何。

1958 年台海危机、69 年中苏动武和“文革”、天安门事件中，许多官兵不惜生命服从中央的回避冲突严命。中共军一面和友军部队争功意识强，同时下级对上级、军队对党、国以忍从为美德的观念又很重。解放军在 99 年治长江洪灾时大显身手，张万年陪同江泽民视察时特意表示将救灾部队全权交国家抗旱防涝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副总理调遣。为国家利益而甘当无名英雄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师出有名的道德律、名誉观相通。

“党指挥的枪”、“国家机器的螺丝钉”的性质，无形中消除了军队恶性膨胀的根子。党、国、军都有富国强兵志向，军工产业的利益和战争的损失也由三者负担，因而军队本无必要冒险挑起战争。国防预算增加的惯例化考虑到相当比重在于人员费，也可从某种意义上看作缓解军队欲求不满的抚安。有如常言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中国官、民都把军队当作为防万一的保险¹⁴⁷⁾，故不至于像日本自卫队有被国民视作“税金小偷”的压力。日本人出于不愿给人添麻烦和花钱买安心的动机趋向多上人寿、事故等保险，投放保险资金被称为仅次于住宅的人生第 2 位购买大件，占所得、财产比重在世界上属最高水准¹⁴⁸⁾，而与其“过剩保险”同样引得外部惊诧的中国国防预

算也是安身立命的必要投资。

杨志卖传家宝刀时牛二执拗地逼他斩己来显刀快,“青面兽”怒从心头起杀对方而被下狱。《水浒传》留下了如此价值判断:赌命是无赖行径,而跟着对方赌命是沦为无赖的愚蠢举动。在霸权势力和“无赖国家”挑衅甚多的今天,这一教训作为大众共识和社会原理依然有效。为证明实力的有勇无谋受蔑视构成心理上的保险装置,脍炙人口的韩信“胯下之辱”也教给人们不理无赖挑衅的理性。项羽不习敌一人的剑术而学敌万人的兵法,从不带枪更不用枪的毛泽东无疑受了其价值观影响。儒家要求匹夫具备对于天下兴亡的责任和勇气,同时儒家和兵家又否定匹夫之勇而赞许高层次的大智大勇。韩信的雌伏貌似丢了男子汉体面却赢得了好汉中之好汉的美名,遂成为建设性的长期观点和思路转换的典范。

韩信由于刘邦、吕后猜忌而被收权夺命,但尽管有实力、军权却不谋反、抵抗。毛夫妇主导的“文革”中不少将帅甘受撤职、监禁,可说是蹈袭这位名将的态度。中国历史繁衍祖型部分甚多,毛、邓指名华、江为下代领袖也以刘邦为从乱世转向平时而让平庸的务实调整型文官继任为鉴。得天下后稳妥运作能得“无事是名马”好评,这一价值重点转换也是抑制冒险的安全阀。胡锦涛用多年专事军务管理的曹刚川为国防部长,也表现出和刘邦、后毛、后邓时代共通的稳健志向。总装备部首任部长曹的作用,和建国初任代总参谋长、北京市长后出任国防科委首届主任的聂荣臻相似。那位开国大典主持人及“核弹之父”对贸然参战朝鲜和出动军队镇压群众持否定态度,两次都受到了党内的共鸣、赞许。

《孙子兵法》第2、3篇《作战》、《谋攻》强调战争消耗极巨并以避战为最善¹⁴⁹⁾,毛泽东也将保存自己作为消灭敌人的前提及目的。毛大力提倡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勇猛顽强作风,前线实情却是部队要求保全实力、温存体力的呼声甚高¹⁵⁰⁾。金门登陆强攻战时也出现反对意见,对其不置一顾的指挥官的失败遂成为肯定合理的安全意识的教训。¹⁵¹⁾

相当于唐僧束缚孙悟空的紧箍咒的自动闸之一,是真正溶化在中国人血液里的终极行动原理——格言、警句。正如李光耀所说,毛仅有一生时间故无力抹去4千年历史和传统,哪怕书都烧光也不能阻止俗语、谚语在人民记忆中长存¹⁵²⁾。就韩信忍辱过关的故事而言,“忍气吞声祸自消”、“好汉不吃眼前亏”、“烦恼皆因强出头”等谚语,都构成份量不亚于“君命”(领袖意志)的“天声”(自然法则),而“君命”本身也多带这类“天声”。

4. 中国人的现世至上、“己身中心”主义和“小皇帝”现象所致厌战情绪、弱化趋势。

在中国因宗教观念薄弱而绝对的神和信服神都难以成立,现世至上主义产生和强化了对生的执著。“国以家为本,家以身为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儒教观念,使人们难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愿赴自爆恐怖活动。最近由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引起的外交摩擦中,韩、日都有砍手指、自焚抗议者而在中国难于想像。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曾断小指抗议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被赞为有安禄山之乱时唐将南霁云遗风的这类舍身消失久矣因既无传统肯定又缺现实基

础。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韩国大众纷纷捐金首饰共度国难，而同时期中国百姓捐躯精神之淡薄只需看内外受灾时自发解囊程度便可知。

内政、外交手法被国内舆论视为赌徒色彩浓的小泉首相酷爱西部剧，而邓小平在得克萨斯为取悦民心曾换上牛仔打扮观看斗牛，但和美国拓荒者只身闯险、冒死决斗的痛快淋漓比，邓提倡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摸着石头过河”更富中国特色。《增广贤文》的“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处且缩头”，可结合毛借用曹操《龟虽寿》规劝林彪戒毒养身，悟到“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长寿秘诀之一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各人自扫门前雪而不愿流血自尽为他人做嫁衣裳，本是中国民众天经地义的普遍心理。

中国不乏只身入虎穴或千里走单骑的匹夫闯险佳话，中共老一辈的“把脑袋系在裤子上干革命”亦有古风，但欧美骑士道、西部剧的为爱情拼死活或拿性命赌枪法距中国文化传统甚远。“9.11”恐怖袭击原型为太平洋战争末期日军“神风突击队”，而以简易飞机去撞敌舰的必死拼法由日本人首先大量采用，精神根源在于与欣赏来去匆匆的樱花一致的花开花落两由之的恬淡，及从古代名将到当代首相、平民都醉心的“人生五十年”¹⁵³⁾的“浓缩志向”¹⁵⁴⁾。崇尚松柏长寿、将50岁称为“半百”的中国人则不易轻生，以至《辞海》的“自杀”词条都不忘提醒“在尸体检验中，应注意区别伪装自杀”。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直升机出逃失败自杀，偷生的7341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并未遭人蔑视。

作家三岛由纪夫1970年在自卫队驻地剖腹自裁并为速死让同伙砍下脑袋，令世人震惊的“武士道美学”表演在中国人看来令人作呕。然而他组织的极右保皇团体“盾会”煽动的武装起义受到自卫队官兵抵制，使人想起4分1世纪之前的“肉弹”其实也并非浑身是胆。伪满“皇帝”溥仪临近战败时在日军高参驱使下给即将一去不归的“挡体”者打气，惊讶地发现这拨“敢死勇士”满脸灰暗、泪流双颊。¹⁵⁵⁾当事者们战后纷纷戳破往昔当局炮制的“皇军”神话，证实战场上临死时几乎无人高呼“天皇陛下万岁！”而多是叫唤“妈！”

汉语的“天哪！”和“妈呀！”也提示了中国人的心灵避难所和归宿，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流行、获首届解放军文艺奖的抒情歌《再见吧！妈妈》（陈克正词，张乃诚曲），就表露了在效忠祖国母亲之前眷恋亲生母亲的天性。中共为克服“文革”后信仰危机而以“儿不嫌母丑”呼吁爱国，但对越出击前夜驻地据传依然有万马齐喑暮云愁¹⁵⁶⁾。中共军攻心战时常喊的“不要当炮灰”似不自戒成份，如解放上海前夕炸敌军火库时先安排好退路而没有玉石俱焚的打算¹⁵⁷⁾。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当时军内就有人认为违反带支架规定而不算英雄¹⁵⁸⁾，日军攻沪时连人带铁丝网报销的“3勇士”神话也无独有偶地是失误结果¹⁵⁹⁾。

纪念太平洋战争爆发60周年的好莱坞巨片《珍珠港真相》，歌颂了1942年罗斯福下令的报复轰炸日本。该举动确实长己志气、灭敌威风但从航空母舰出发时就明确不能返航，因而和“9.11”自爆团队只练起飞不学着陆殊途同归。1986、2003年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哥伦比亚号”机毁人亡亦属梦灭玉碎，而中国载人飞船以配备逃逸系统自豪¹⁶⁰⁾。刘邦智应鸿门宴所体现的“三

十六计，走为上计”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效法¹⁶¹⁾，最终折戟沉沙的林彪其实一贯注意家人分乘飞机，毛建国不久更是被中央禁飞以防不测。¹⁶²⁾

毛泽东在党代会赞扬中苏边境冲突时战斗英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正因为现实生活中厌恶辛劳、牺牲者为数甚多。朝鲜战争时林彪称病回绝毛点将就任志愿军司令，60年代初某中将不从中央关于赴非洲某国任反政府军顾问的命令，两人都未因此直接蒙受不利待遇¹⁶³⁾，显示了铁的纪律统治的局限。内战时代为数不少的中共官兵不顾极刑处罚而逃脱以至叛变，也是出于对战死的恐怖或疲劳、达成目标后的松懈。¹⁶⁴⁾对利害、得失敏感的国民性在和平时代也依然如故，对献身精神敬而远之的风潮“文革”后益发蔓延。

中国在惩罚越南之后再未有过对外军事行动，也可归结到同年伴随改革开放正式起步的独生子女政策强化。在以断子绝孙为大忌的这个国度中，“独苗不抽丁”的观念仍旧存在。限制出生不仅减弱了人海战术的威力，而且招来了难以进行战备、战争的事态。随着子女的稀少价值上升到无可取代的地步，社会的“小皇帝”化也波及到军队，战意、战力以至生活能力、管理能力均呈弱化趋势。《末日之门》中军委审议是否冒险对抗印度时，使满座空气一下变得沉重起来的总参谋长的忧虑便是：“现在的士兵已经是独生子女的一代了，投入战争带来的后果将比十年前二十年前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憎恶叛逃的毛在陕北见溜号抓回的年少警卫跪泣求饶都不禁动恻隐之心，表示理解吃不了苦和想家情绪而超法规地下令免罚款待，¹⁶⁵⁾而虎威神气先天不足的新“领头羊”又如何去因势利导？

麦当劳于天安门事件翌年在深圳开中国首家店，紧接邓小平南巡后又在北京展开连锁经营，于现代化、全球化两方面都有深远意义。精通中东问题、两度获普利策奖金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弗里得曼（1953—），在两位中国同世代人刊行《超限战》的同年公布如是命题：有麦当劳的任意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在麦当劳于其处开张后未曾交战过。他提出的“防止纷争的M型拱门黄金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发展到出现大量中产阶级足以使麦当劳连锁店得以发展则可划作“麦当劳国”，其国民宁肯排队买汉堡包而不愿打仗。¹⁶⁶⁾继日本（1971）、香港（1975）、新加坡（1979）、台湾（1984）、韩国（1988）之后的中国接受麦当劳，证实了亚洲经济及民主化的雁行型成长，而生活水准、对外开放程度、与国际社会的连动、顺应度的提高有助于避免战争的原理，也由中国的和平、繁荣得到了证明。

林彪逃避出征被断罪为贪图安逸，而安逸滋味一旦尝到就难舍弃。温饱、小康的基本实现一面招致了奋斗精神衰退和衣食足而忘礼节、贪得无厌而不知足，但又有将过份斗争心转化为平常心的效果。东北亚安保的突出障碍在于距麦当劳开张甚远的朝鲜的军事威胁，其根本解决途径也无非是通过经济发展实现和平演变。繁荣离不开和平而繁荣的实现又成为终极性的安全保障，后一点从当今俄罗斯逃兵役横行中可窥见。往昔的大霸正如麦当劳于1990年进入所示，苏联解体后生活水准和价值观产生剧变。同为社会主义军事大国而在致富道路上先行的中国，也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传统而会出现类似现象。

克林顿逃脱越战服役的经历并未影响当选总统，也是象征着冷战后价值观变化。越战时代美国人的厌战情绪除人道、和平的理想外，恐怕也有眷恋经济大国的甘美生活而忌避远方贫困地区的战争冒险的现实选择。2002年在中东大搞自爆攻击的某恐怖组织的头目的夫人，就私下吐露自己子女马上要进大学而不能去送死，其双重标准引起了物议和嗤笑却不无普遍性。高学历者居多的奥姆真理教徒在东京地铁撒布沙林时小心翼翼地确保安全撤离，教祖在警察搜总部时躲进夹层以致被捕时和日后的候赛因窝地窖一样尊严扫地，便符合这个世界头号长寿国越来越与“狗不嫌家贫”、“家贫出孝子”格格不入的现实。

美国越战中失去国民支持似也因国家利益未与个人利益连动，牺牲的要求超出大众承受范围，中国在对越作战后也有类似的失衡。其后当局致力裁军和改善军人生活，在摸索规模与好处、危险和回报的适当水准这一意义上有合理性。削减兵员和提高待遇使丧失和享受的反差进一步扩大，其结果能抑制冒险。军费增额中人员生活费占相当部分，显示了随战时体制褪色军队走向普通化。入伍动机中多掌握驾驶技术之类的趋向，也与和平国家的“普通军队”——日本自卫队相通。军人的技术兵志愿和工薪族化的抬头，是过去被压抑的个人谋求生活安定、自我实现的欲望受重视实利的合理思考肯定的结果。“战争机器”在“文革”后、冷战后的部分“经济动物”化，既有违和感又有创造和与和平的建设性。

“和平”字面包含的亲和平的重要性，在天安门事件的军民摩擦中得到更深共识。“人民的子弟兵”以不分青红皂白的扫射喷出怒气，其背景中不可看过的一点是：对民众的强行阻止和歧视性言论的忍耐超过了限度。“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的固定观念、“军民鱼水情”的神话破灭，促使崇尚非凡、惯于非常的思维向不嫌平凡、亲近平常的方向转换。

军队和国家、人民的“鱼水相依”，正如日本谚语“鱼有心水就有情”，需要投桃报李式的相思相爱加互利互惠。邓小平时代实践成功的裁军和长老退休制，实质与建国初期为私营企业国有化付定息补偿、在“反右斗争”中被封杀的“老干部赎买”设想相近。江泽民大封将军不免被视为换取支持的交易，但看成稳定军心的“维持费”支出则未必无公益。

21世纪首位新国防部长由军总装备部首任部长担当，可视为以武器优化减轻人员负担路线的反映。考虑到美军非带空调的坦克不能打仗的现状，军队亦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警句所示，有在和平“微温汤”（日文，指温吞水、温澡水，借喻平稳舒适环境）中沦为失去气力的“煮蛙”（适应温澡水而对逐渐加温反应迟钝最终致死的青蛙）之虞，但这种消极变化本身又能成为规避战争的有力动机。高富裕会刺激保卫财富、余裕的意欲，因而安乐生忧患的似非而是之说又包含似非而是的安全阀。

5. 由“穷则独善其身”观念和“实惠社会主义”路线而来的和平愿望。

林彪躲开并反对参加朝鲜战争被看作“恐美病”，但建国伊始应专心于安定、建设的主张有一定道理。某中将抗命赴非洲帮助反政府军打游击，或许也有对发展中国家战乱、贫穷的抵触情绪，

但毛泽东时代的支援世界革命因加重本国贫穷而受到了反省，朝鲜、越南战争后中国遭到当时鼎力支撑的对方负心离异，因而认识到战争和援外的浪费和空虚。

赫鲁晓夫撕毁斯大林提供战费的承诺要中国支付援朝战争半额费用，给陷入建国后空前天灾人祸的中国又增一难。与朝鲜的“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也因金日成为巩固自身权力、维护本国利益的对华保持距离、在中苏间玩平衡把戏而早已淡薄。越南用抗美援朝时中国提供的武器、传授的战法，在其后领土纠纷中痛打往日恩人。这一系列教训使中国痛感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遂产生了优先本国建设、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新思考。

中国近代以来对别国未进行过旨在征服、占领的侵攻，毛泽东在对苏抗衡、对美接近的晚年提出“不称霸”，是基于国力衰弱的现状、竭力维持适度规模国土的守成之守势、也是中国不侵犯他人又不容他人侵犯的传统观念所致。中共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源于古代“王者之师”的“秋毫无犯”传说，而战国初哲学家杨朱的“不拔一毛而利天下”的“极端个人主义”，又可释作不拔他人之毛利己的互不侵犯意向。毛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宣言，也符合中国社会的“井水不犯河水”原理。

金日成为温存实力有意让志愿军担风险的如意算盘使彭德怀蹙蹙¹⁶⁷⁾，但本钱有限一方的利己本能又不乏合理性。中国格言说“杀人一千，自伤八百”，毛对彭“百团大战”不以为然也正因于穷光蛋没能耐去和龙王比宝。抗日战争的“惨胜”使人深切认识到：战争的有害无益对于承受能力弱者尤甚。当今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自居、“闷声大发财”式地致力本国经济，符合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初级阶段”¹⁶⁸⁾。毛晚年也悟到“要先把中国的事情搞好”，他念念不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人类有所贡献”都有赖于国力强盛，因而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重点建设经济堪称“曲线济世”。

独善其身、专心防卫也是国情基础条件所规定，因而有超越和改造主观意志的强制力量。邓把国土辽阔比作“块头大”并举为不易被外国吞占的有利之处，¹⁶⁹⁾但和 15 个国家接壤、与其中一部分陆续发生过边境冲突的现状，雄辩地证实了维持广袤的幅员本身就相当不易。江、胡时代的波及五湖四海的大洪水（1999）和致死性新型肺炎（2003），表明对付天灾人祸的“无硝烟战争”负担之重。人满为患的实情同样使中国不可能抱扩张的念头，因实现温饱、小康几乎要耗去领导人的全部精力。毛主张“人多好办事”却又感叹“大有大的难处”¹⁷⁰⁾，地广众多的规模和大国风度一道又有难以挑起事端的意外好处。

江在 16 大总结执政 13 年之际，把给予人民建国后空前实惠算作一大功绩。“实惠”一词在党代会政治报告中登场，是改革后“经济动物”化表现和“江南帮”带来的新风。邓发动的对越惩罚战中发生殊死搏斗、英雄部队辈出的老山地区，1999 年末划界协定中归越南所属。按以往拘泥体面、一味争气的习性难以想像的这一结局，是为和平、繁荣而“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到“放下包袱，轻装前进”。邓不齿于“穷社会主义”而以“抓到耗子”表达的“实惠主义”的成功实践，成为朝鲜目前试行的“实利社会主义”的先师。

6. 扎根于传统、超脱于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权的政治、军事、外交的现实主义。

江泽民时代军事紧张限于域内的台湾海峡和海南岛一带，前者不过是威慑性演习而后者则是中国在撞机中受美国之害。发射导弹引起振荡的 1996 年台海危机，和 38 年前炮击金门相似的虚虚实实是可观之处。当年迅雷不及掩耳的万炮击轰一时被当作朝鲜战争奇袭的再来，然而毛不久即决定改为隔日打炮。此后双方炮火应酬心照不宣地回避杀伤的奇观，在中美建交的 1979 年元旦由大陆宣布结束。在改革开放元年的头天发出信息的中美和解、中台缓和，其后越过多重波折大体上得到了维护。旷日持久的象征性仪式化表演的废止，是不拘形式、重视实效的务实精神的产物，以及非攻、避战的意志表示。

海湾战争和美英攻伊据称有处理到期军火动机，炮击金门也兼淘汰军火和训练炮兵的目的¹⁷¹⁾。和“文革”中“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偏激论调相反，是一举三得追求政治、经济、军事成果的深谋远虑。毛泽东时代为战备而不惜破费人力、物力、财力，大搞疏散和内地三线军工建设，而在以发展生产力为最大政治的今天则难以再优先军事。对越惩罚作战含确保周边安全、争取国内安定的政治意图，及积累实战经验的军事目的。这类一劳永逸的大动作后未重演，符合实践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现实主义。

对越作战尽管兵力、武器上拥优势却未能轻易全胜，促进了反思战略、战法和认识军事手段的局限、代价。“文革”中毛关于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在邓小平时代被作为过度估计危险的错误。摆脱冷战下的神经过敏和高风险、高回报志向，冷静地想定战争的盖率和回避的可能性，可称是“新时期新长征”之进步，然而中共除建党初期和“文革”年代的“左派幼稚病”、教条僵化症外，又有虚心接受失败、灵活修正轨道的优良传统。

毛被礼赞为“军事家”、“导师”（教师、教官、教祖），而中共得天下后在理应拿手的军事教育领域内，却特聘元国民党军教官在军事学院授课¹⁷²⁾。除系统加强军事理论的实用主义外，或也有以败军之将为反面教师的意图。毛在长征中被推举作军事最高指挥者和事实上的党魁，契机是纠正党中央领导在军事上的失败，由此可看出中共对有可能发展为重大责任问题的军队的挫折容忍度低，同时也说明在军事上拯救党、国的贡献特殊。

林彪成为毛接班人除军事独裁的需要外，在“常胜将军”功绩中也有一定必然性。周恩来铭记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叶剑英体现的“诸葛平生唯谨慎”，他在军事、政治两面实践了大半生。毛战争中对其过于慎重偶觉不满¹⁷³⁾，但以毛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轻视敌人”衡量，其指挥艺术毋宁近乎王道，倒是毛在内战中取胜后因自满盲信吃了亏。建国伊始金门登陆战以中共军史上未有的 3 个团悉数覆灭告终，参战的华东野战军磨难不及林、邓分别率领的东北、中原野战军，不妨引为失败的远因。西北野战军的彭德怀任志愿军首位司令，他和湖南老乡毛同是不服输的激情家，又都有过高估计自己精神力量之处。毛在攻克汉城后无视部队的休整要求而命令抢占 36 度线地区，虽可理解其欲捞谈判筹码的急切心

情，但无法否认轻敌、冒进。¹⁷⁴⁾

开国和占领外国首都的快举后的挫折使人感到得意和失意只隔一层纸，而祸又化福的结果使这笔学费逐渐得以回收。金门战役指挥官叶飞将落后于时代的战略战法作为最大教训，反省了在无制空、制海权情况下强行渡海的莽撞。¹⁷⁵⁾没有万无一失的准备则不至于贸然强攻台湾，可说是吃一堑、长一智的理性态度。朝鲜战争后与美国之间未发生公开、正面、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是因林彪预料到的敌手高强而被挫伤的学习结果。对越惩罚的苦斗势必同样烙刻到下一代记忆中，将成为防止狂热的镇静剂。

毛炮击金门时最担心和美国冲突，严命炮台官兵不得触及近旁的护航美舰，纵令美舰还击也不得还手。在心理、技术上均属难题的指令使前线官兵怀疑听错，¹⁷⁶⁾而由此可看到军事、外交一体化和国际战略之至上。援越高炮部队与美国空军展开殊死交锋，却不堂正亮出旗号而将参战事实对内外隐秘多年，也是出于同样的计算。对照对外全力反帝、对内大搞革命化的时代空气，“双轨”并行不悖就更明显，其基本思考在后代也得到继承。

2001年4月1日海南岛近海上空中、美军用机撞击事件，和1965年4月8日海南岛空域两国空军交锋（结果美机误将友机击落）¹⁷⁷⁾相叠影，中国两次都既不辞正面迎击又竭力回避对抗升级。1999年美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造成记者死亡，惹起中国大众反美情绪高涨、两国对立激化，而中国一方面强硬抗议并索得巨额赔偿，同时又致力平息群情、对美修好。这回海南岛冲突也由于双方的软硬兼备，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毛泽东“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和香港财阀右手握对方手而左手打对方脸的商战¹⁷⁸⁾相通，后者又是国际社会的秘而不宣的真实原理。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曾称两国尽可用单手对打，但重要的是切勿松开握着的手。毛断念攻占金门除力不从心、得不偿失的实情，及回避与美军第7舰队冲突的顾虑外，也有确保中美对话渠道的战略意图。不断保持谈判、协商的可能性和途径的贤明做法，也体现于台海危机中江泽民、李登辉的密使在海外私下接触¹⁷⁹⁾。“6.4”后不久7月1日老布什密使访华与邓通气¹⁸⁰⁾，其原型之一是1969年“9.11”讲和晤谈。胡志明逝世后周恩来为回避与苏方碰面抢先赴越吊唁，葬礼后柯西金归国途中又接受提议在北京机场见面，双方议定举行外长级谈判缓和了战争危机，而2年后同日周宇驰在西郊机场内据点发出的撞天安门的叫嚣则相形无力。

毛取孔子“敏于事而慎于言”给女儿分别起名“敏”、“讷”，邓天安门事件后为打开在国际孤立而提出的外交战略中，也有“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和“抓住时机，有所作为”两面。机敏地把握机会和机微去不声不响地积累收获的手法，转借林语堂形容苏轼双重性时所引的《圣经》语录，也是“鸽子似的温良，蛇一般的睿智”¹⁸¹⁾的胡、温之特长。将中国的统治法则、社会原理归纳为“外儒内道”的见解颇有意思，看似柔弱、空虚、无为的道家在政治、军事、外交领域能与儒家、法家、兵家结合。

关于毛泽东时代“外毛内周”二重性的分析¹⁸²⁾也有独到之处，而提倡松树般坚定性加柳树般

248 (248)

灵活性的毛又兼具不少周恩来的资质。他在台湾归属中国问题上对国民党、美国都寸步不让，同时又表示两岸统一哪怕等一万年也不妨。打美蒋混成舰队时专敲一方而避开另一方，也是“革命的两手”和分寸感的表现。他对尼克松把“打倒美帝”等号召自嘲为“空炮”，而光瞄不打、有意放跑美舰之举显示了外虚内实的玄妙手腕。

美舰眼看蒋军舰只中弹却放弃护卫，使毛边戒备“超限”边观察反应的试探获得成功。他似乎是不知天高地厚地贬美国的“纸老虎”，这类真真假假在国际关系中形形色色层出不穷。“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中国式讨价还价窍门，在围绕台海危机和海南岛空域冲突的交涉中也是中国所惯用。无论对立双方的立场、要求开始相距何等悬殊，中国即便出于理念、策略唱高调、显强硬时也始终脚踏实地。

先于毛的“空炮”和邓的“小钢炮”（留苏时代的绰号），孙中山因豪情、壮语而有“大炮”的诨名。但他在政纲中又大量提示了建设方案，《建国方略》（1917—19）充满拓展铁道等基本建设的蓝图而绝少火药味。毛的《论十大关系》（1956）和自知领导经济本领不足的焦躁，似也有欲全面超越上代“国父”的强迫观念。而 21 世纪初领导党、国的技术专家出身的能吏团队，无异将更加发扬他们在经国济民中未彻底实践的务实精神。

毛、周建国前后以相似语言宣称：自己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之后都首先是中国人。¹⁸³⁾正如“红都帝、相”的自我规定所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原理和中国传统“即物”（从物质出发）、变易观念，在共产党时代得到水乳融和的结合。美伊战争中外交部高官与网民讨论之际，以确保石油等国家利益理应优先为由说服感情用事的反战、厌美主张。国益至上的现实主义作为大道理受到认同，其社会新风也是可靠的安全阀。

毛在内战和朝鲜战争中被国民党、美军杀害了妻儿等亲人，他和周被蒋政权重金悬赏过头颅，但以“匪贼”对骂多年的国共为抗日而结成民族统一阵线，毛不计嫌仇与“美帝头子”握手言欢打开缔交之门。对家人牺牲的淡然处之被俗人非难为冷漠，但可理解为超越小我私情的高境界。¹⁸⁴⁾蒋经国在被日军炸死的生母墓上刻“以血还血”誓言，蒋介石却为斩断怨怨相报的连锁及对付中共而怀柔日本。中共保护蒋氏族坟及中山陵附近戴笠墓终收到统战效果¹⁸⁵⁾，台海两岸共有的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无疑会抑制感情用事。

（未完待续）

注

- 1) 日本《东洋经济周刊》2004 年 1 月 31 日号特辑题为《20 年未见的牛市：铁、金、小麦……国际素材行情猛长 背景为中国“暴食”》。
- 2) 谷口诚《东亚共同体——经济统合的前景和日本》（岩波书店，2004 年）等诸多著述、报导。
- 3) 日本发现、驱赶中国核潜艇后不久，2004 年 11 月 19 日陈水扁对日台交流协会会长说台事先向日美作了通报。但 25 日《朝日新闻》报道予以间接否定，称契机是美国提供的机密情报。

- 4) 美国副国务卿阿米特基推测其目的是刺探美军情报（采访录《日美同盟能应付中台危机》，日本《中央公论》2005年5月号，202页），而《产经新闻》2005年5月5日报导，中方人士透露解放军研究机关把关岛作为最重要的调研项目之一。
- 5)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00年，639页。
- 6) 多家网站以《信念与道德》为题登载的刘亚洲讲话，据称是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时对昆明基地干部所作。与注7列举的数篇论述一样缺乏确证但亦不见辟谣和撤消，本文在此权作网络空间传播的军事新潮加以引述。相传毛泽东1974年填《诉衷情》词赠周恩来，尼克松《领导人》（1982年）及延安时代曾与毛交往的舒群著《毛泽东故事》（作家出版社，1986年）均全文引用。陈晋称已证明非毛作但因逼真而使人深信不疑、广泛传抄（《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82—383页），这位毛诗词研究权威的《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4年）第22章题目——“业未竟，鬓已秋”，也套自其中“业未就，身驱倦，鬓已秋”。由此想到本文所引若干刘亚洲言论，纵使作者相异也未必失尽主观真实及客观价值。
- 7) 江、胡时代之交多家网站竞相转载《金門战役检讨》和《大国策》（均为2001年）、《关于伊拉克战争》（03年），引发注目褒贬。
- 8) 《国防黑盒子与白皮书》（福尔摩沙基金）合著者柯承亨，现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跨世纪兵法——陈水扁看国防政策与管理》（明报出版公司）合著者周婉菁，当时任陈国会办公室助理兼国防小组召集人。
- 9) 多家网站登载的黄国光采访录《乔良——一位神奇的预言家》。
- 10) 黄国光《乔良——一位神奇的预言家》。
- 11) 坂井臣之助监修、刘琦译《超限战——21世纪的“新战争”》，共同通信社，2001年12月。
- 12) 藤井严喜在《由恐怖活动到超限战争——战场无所不在》（广济堂出版，2001年）中，透露该会01年3月发行了仅印15部的研究会纪录并附台湾大学郑钦仁教授的论文（22页）。作者未公布其成员，但提到执笔时得到原公安调查厅第2部部长和美国智库大力帮助（214页）。
- 13) 宫崎正弘《胡锦涛——中国新霸权战略》，KK畅销，2002年，72—73页。
- 14) 黄国光《乔良——一位神奇的预言家》。
- 15) “离见”为15世纪上半叶日本能乐大师世阿弥的理论，意为演员脱离主观眼光去客观审视。
- 16) “文有正位，不可太粘，亦不可太离。张宾王常阅发一义云：他人说得少愈多，子说得少愈多耳。张元长云：作文如打鼓，边鼓须极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几下。二老真狐精也。”（《尺牍新钞》一集闻启祥《示弟子》）“张元长云：作文如打鼓，边鼓虽要极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几下。予谓鼓心里，但少不得几下耳，却多打不得；以打鼓边左右时，其下下意，都送到鼓心里去。”（《尺牍新钞》二集林嗣环《与吴介兹》）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4页。
- 18) 古体词“蝉联（蛛丝）体”典型以毛作品为例，可举出《采桑子·重阳》（1929年）中的“……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不似春光。胜似春光，……”。
- 19) 王苏红《空军征战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117—118页。

- 20) 周恩来 1973 年陪蓬皮杜访延安时震惊于贫穷而流泪向当地干部致歉，毛则一次未回陕北视察。
- 21) 保健医生张佐良称周的一大遗憾是未去西藏看看，因中央考虑带着心脏病飞青藏高原太危险而不同意。（程华编《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年，527 页）
- 22)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在会见后向记者发布的谈话内容。
- 23) 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1966—1976》，华文出版社，2002 年，下册 490—493 页。
- 24) 笠井孝之《毛泽东与林彪：追踪“文革”之谜——林彪事件》，日中出版，2002 年，172 页。
- 25) 叶永烈《陈伯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0 年，456—465 页。
- 26) 《解放军报》1991 年 3 月 31 日报道《纵论天下大事 共商国防体系——江泽民杨尚昆与解放军代表议政侧记》、《女将军论兵》。
- 27) 张聂尔《中国 1971——一九一三风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年，198 页。
- 28) 左赛春《中国航天员飞天纪实》，人民出版社，2003 年，2 页。
- 29) 语自法国占星家诺查丹玛斯撰《预言集》（1555）中最著称、“9. 11”袭击使之不意实现的“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
- 30) 山本七平《参谋学——读〈孙子兵法〉》（日本经济新闻社，1986 年）贯穿对日军战败的反省。
- 31) 先后由陆军中将、中校和海军大校主持的该所，1941 年 8 月从朝野抽调平均年龄 33 岁的研究班子组织假想内阁模拟演习，其中充当日本银行总裁者战后真出任该职（详见猪瀬直树据此史实写的报告文学《日本人为何进行战争？——昭和 16 年夏的战败》，世界文化社，1983 年）。
- 32) 吉田茂在《回想十年》第 1 卷（新潮社，1957 年）起首，就记述了豪斯“大校”的这段告诫。
- 33) 中曾根康弘《自省录——作为历史法廷的被告》，新潮社，2004 年，28—29 页。
- 34) 穗苅英嗣《赤裸裸的女王——田中真纪子秘书日记》，文艺春秋，2003 年，230 页。
- 35) 石川九杨《二重言语国家——日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9 年，109—111、141 页。
- 36) 周恩来和基辛格 1971 年 10 月 22 日会谈时交换对日本的想法，一致认为日本人视野狭窄。周称他们和英国一样是岛国集团，基认为日本人和日本社会有特异性，并同意周关于昭和天皇极为复杂的评价，说此人无法推心置腹。（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档案图书馆《尼克松总统文件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档案》[2002 年刊电子版]，日文版 [毛里和子、增田弘监译《周恩来、基辛格机密会谈录》，岩波书店，2004 年] 196 页）
- 37) 文艺评论家、庆应大学教授福田和也在《“饱食总理”森喜朗的胃囊》（《文艺春秋》2000 年 11 期）、《怪人宰相——小泉纯一郎的餐桌》（02 年 7 期）中，针贬了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 38) 乔良、王湘穗《〈超限战〉日文版序言》，《超限战》日文版 3 页。
- 39) 索尔兹伯里《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 年）等。
- 40) 佐々淳行在《危机管理要诀之一——可信赖的领导人的条件》（PHP 文库，1984 年）中，引某原国民党将军之言（168 页）。
- 41) 唐朝中期朱景玄于画品中提出逸品，位于神、妙、能品之后，宋初黄休复将逸格列于三品之上。

- 42) 大竹慎一《金钱的法则》，日本经营合理化协会出版局，2003年，342—343页。
- 43) 《庄子·内篇·应帝王篇》中，有中央之帝浑沌被南海、北海之帝善意地开凿七窍而死的寓言。
- 44) 尼克松《领导人》终章〈领导人的资格〉的主旨之一。
- 45) 本文作者由《“五七一工程”纪要》攻击毛的“封建社会主义”联想到的名称。
- 46) 本文作者由陈云1982年提出的“鸟笼经济”派生的概念。
- 47) 据报，朱镕基1996年12月23日在首都剧场观看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商鞅》时感伤落泪。
- 48)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 49) 坂口安吾《日本文化私论》（1938年）。
- 50) 王力证言见于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等。
- 51) 权延赤《龙困与微行》下部《杨成武在1976》（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等。
- 52) 二人的特殊关系见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162页。毛改《七律·西行》见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毛泽东诗词集》，264—267页）。
- 53) 《超限战》写作“戈第安之结”，用意则为说明一刀两断的解决在当今世界上愈发不易。
- 54) 据权延赤《杨成武在1976》称，陈毅获悉毛的评价后大快并当场宣布而使红卫兵批斗告终，林彪身边工作人员们闻讯激赏陈老总痛快风流，连叶群都不得不赞同。
- 55) 尼克松在专论赫鲁晓夫的《领导人》第6章中，宣扬了以此压倒对方、双方一笑了之的一幕。
- 56) 早坂茂三《天无绝人之路》，祥传社，1991年，111页。
- 57) 韩素音《长兄——周恩来和现代中国的建设1898—1976》（1994年），日文版（川口洋、川口美树子译《长兄——周恩来的生涯》，新潮社，1996年）81页。
- 58) 详见大鹰《志愿军战俘纪事》（昆仑出版社，1987年）、刘亚洲《金门战役检讨》。
- 59)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218页。
- 60) 《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348页。
- 61) “61人叛徒集团”案1978年11届3中全会正式平反，其实1945年中共7大时已审清，1966年康生唆使翻旧账时周恩来曾致电红卫兵澄清。
- 62) 宋国涛编著《十大司令员》，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4年，355页。
- 63) 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作家出版社，2005年，377页。
- 64)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4年，100页。
- 65) 张涛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日文版第6卷（伏见茂等译，冒险社，1997年）103—104页。
- 66) 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下册552—553页。
- 67)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100页。
- 68) 叶永烈《黑红内幕——叶永烈采访手记》，作家出版社，1999年，上册237、266—267页。
- 69) 同注25。

- 70) 后改为“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 71) 李文卿《近看许世友 1976—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年，158—159 页。
- 72) 李文卿《近看许世友》，274—276 页。
- 73) NHK 采访班《NHK 特辑 周恩来的决断——日中邦交实现经过》，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3 年，141 页。
- 74) 吉姆·罗杰斯在《冒险投资家》（2003 年）中称“在中国看到了最高的资本主义”，“中国人自称是共产主义者，而实际是世界最高的资本主义者。”（日文版 [林康史、望月卫译，日本经济新闻社，2003 年] 63—64 页）
- 75) 旅日台湾作家，实业家丘永汉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中央公论，1993 年）等中，称日本为“匠人国家”而中国为“商人国家”。
- 76) 《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1921 年 12 月 10 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 6 卷，中华书局，1985 年，35 页。
- 77) 马立诚在《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1999 年）中，批判了“9. 11”2 周后电视讨论中称道恐怖份子的论调，如主持人视撞大楼时略调整机体角度使接触面积达到最大为沉着、完美。
- 78) 同注 38。
- 79) 钱钢在《唐山大地震》（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 年）的开篇，列举了 191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37 年的日军占领北平等诸多 7 月 28 日的悲剧。
- 80)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有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 81) 1988 年 5 月 19 日谈话《理顺物价，加速改革》，《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262—263 页。
- 82)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开篇即是 1975 年 1 月 25 日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军队要整顿》（1—3 页）。
- 83) 原江苏省委第 1 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长许家屯，1991 年脱党遁居美国后在香港《明报》载文主张“和平演进”（参见《许家屯香港回忆录》，台北联合报出版，1993 年）。
- 84)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98 页。
- 85) 左赛春《中国航天员飞天纪实》，63 页。
- 86) 王凡、东平《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作家出版社，2003 年，322—324 页。
- 87) 王苏红《空军征战纪实》，90 页。
- 88) 山本七平剖析日本社会潜原理的名著中，有《“空气”之研究》（文艺春秋，1977 年）和《“常识”之研究》（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 年）。
- 89) 毛泽东《十六字令三首》（1934—35）其三。
- 90) 李志绥称这句俚语难倒了翻译（《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116 页）。

- 91) 中共特工机构 1927 年 5 月成立，早于国民党中组部党务调查科。1950 年副外长、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主持起草《中共 22 年情报工作的初步总结》，规定情报工作绝不用金钱收买、美人诱感和手枪恐吓等手段。（郝在今《中国秘密战》，1—2、413 页）
- 92) 郑义编撰《国共间谍战七十年》（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中《周恩来躲过喀什米尔公主号空难》（540—556 页）、《张宜生暗杀刘少奇九死一生》（607—615 页）等。《毛泽东机要秘书沈之岳到台湾任调查局长 13 年》一节（598—605 页），被汪东兴等人否认沈吹牛（郝在今《中国秘密战》，139 页），但该书可看可信之处仍不少。
- 93) 蒋介石 1945 年 8 月 15 日庆祝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世界人民广播演说。
- 94) 中日恢复邦交前周恩来向对日工作干部宣讲的放弃战争索赔的头条理由（金圣基《人民大会堂见闻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年] 等）。
- 95) 中国国家画报《人民画报》（人民画报社）2002 年第 12 期特辑报道《与时俱进 继往开来》，开篇称“大国大党，盛世盛会”。（14 页）
- 96) 郝在今认定世界情报界最早的“反恐”规定即 1950 年《中共 22 年情报工作的初步总结》（参见注 91），称其为值得中国情报界骄傲 1 个世纪的先见之明。（《中国秘密战》，414 页）
- 97) 《读卖新闻》2001 年 9 月 18 日引美国 CBS 电视台 16 日报导：1998 年 8 月美国驻非洲国家使馆多次被炸后，克林顿总统令中央情报局拘捕本·拉登引渡到美国，后又将范围升级至暗杀。按上述命令展开的特工行动中，据称包括在阿富汗用火箭炮打本·拉登所乘列车（未命中）。
- 98) JEAN-CHARLES BRISARD、GUILLAUM DASQUIE《本·拉登：被涂盖的真实》（2001 年），日文版（山本知子译，幻冬舍，2002 年）192 页。
- 99) 顾顺章 1931 年 11 月为此悬赏周恩来并谴责康生，而据称监督勒毙的陈赓（郑义《国共间谍战七十年》，43 页）为红军谍报俊杰之一，建国后晋大将并任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
- 100) 南山、南哲主编《周恩来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年，上册 230 页。
- 101) 详见郑义《国共间谍战七十年》中《上海江湾军火库大爆破纪实》。
- 102) 周恩来 1972 年对旅美台商代表团的这一表态，成为翌年被毛泽东批判对美外交软弱的远因（冯治军《周恩来与毛泽东》[香港福皇图书，1998 年] 等）。
- 103) 周 1971 年 10 月对广州部队领导机关干部作报告时，对递条子质疑的解答。（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342—343 页）
- 104) 少华、游胡《林彪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400 页。
- 105) 据熟悉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历史的立命馆大学文学系北村稔教授教示。
- 106) 参见本文作者《“儒商、德治”之道——以理、礼、力、利为主轴的中国政治统治文化（1—3）》（本刊 14 卷 4 号、15 卷 1、2 号 [2002 年]）
- 107) 毛、周晚年常置辛词于身边、枕侧且不时欣赏、引述，详见逢先知《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1986 年）、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等。

- 108) 《浏阳河》旧版中“江边有个湘潭县，出了个毛主席世界把名扬”（尹高朝编著《毛泽东的老师们》，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9页），末尾5字后改为“领导人民得解放”。毛50年代出席中央机关舞会时乐队通常特意先奏这首湖南民歌，而他顿时目光柔和，情思悠悠（王凡、东平《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89页）。
- 109) 江迅《李鹏〈关键时刻〉的关键》（香港《亚洲周刊》2004年3月28日号，36—39页）、王健民《北京酝酿平反 六四光碟打先锋》（同刊2004年6月13日号，44—47页）。
- 110) 郝在今《中国秘密战》，90—93页。
- 111) 毛1937年5月接见2年前策划孙凤鸣行刺汪精卫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华克之时如此表态。毛鉴于正在国共合作谈判故不允华留延安，而派赴华南当与李济深联络的“闲棋冷子”。（郝在今《中国秘密战》，116—117页）。
- 112) 毛1973年2月17日对基辛格说：“谎言、诡计都不要。我们不会去偷你们文件的，你可以故意放到哪里去试试我们。我们也不搞偷听、监听。这类小把戏没有用。大把戏也没用。这话我跟老朋友斯诺也说过。贵国的中央情报局，也是关键时候派不上用场。”基辛格表示同意，说我方以往经验如此。毛说我们的情报部门一样不行，林彪事件他们就没觉察到（周恩来笑），你来中国他们也没发现。（W. 布尔《基辛格抄本》[1999年]，日译本[铃木主税、浅冈政子译《基辛格最高机密会谈录》，每日新闻社，同年]120页）
- 113) 周恩来禁令中共早期谍报机构——中央特科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郝在今《中国秘密战》，8页），建国后中共情报机关在党内秘密侦控或介入政治也远不及苏联（413页）。但毛秘书、水电部副部长田家英庐山会议失足后电话就受监听（苏晓康、陈政、罗时叙《“乌托邦”祭——1959年庐山之夏》，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302页），连周恩来都担心被“自己人”窃听（权延赤《杨成武在1976》，华国锋见汪东兴对己了如指掌亦不禁恼怒：“莫非这家伙也在窃听我的电话？”（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下卷263页）。
- 114) 2002年朝鲜难民闯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事件后日方败于宣传战，同年今里义和在《外务省“失败”的本质》（讲谈社现代新书）中，怀疑中方窃听日方电话遂掌握了主动（182页）。真相姑且不论，如麻生畿《情报不上官邸》（新潮文库，2001年）断言，越是友好国家之间情报战就越激烈，在政府间经济谈判中被美国监听吃亏的日本在防谍上属发展中国家（282—287页）。

毕业于解放军工程学院无线电系、深造于解放军文艺学院的军人作家麦家（1964—），在“新智力文学”、“特工小说”《暗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中，绘声绘色地推出1960年中国组织破译苏联外交部密码获成功的故事。即便是为颂扬他本人服务多年的某特工机构（含监听、破译、行动局）的无名英雄而编造，如是陈述仍可视作隐形战的晦涩回声和“球籍赛”的游戏规则：破译他国非军事密码虽彼此都心知肚明，但绝不能让人抓住证据控告，何况两国当时尚未撕破脸皮，故该尝试一旦败露就会影响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动权和声誉（78页）。

- 115) 1973年韩国中央情报局在东京绑架在野党议员金大中拐回国，韩不久向日谢罪才避免了断交危机；朝鲜

- 也于 70 年代后期为培训日语谍报员而从日、欧诱拐多名日本人，金正日 2002 年为此向小泉总理致歉。
- 朝鲜特工 1983 年全斗焕总统访缅甸时在殉难者纪念堂炸死韩副总理、外长，1987 年为破坏汉城奥运会而安放定时炸弹使大韩民航机从中东归国途中坠毁全员丧生。
- 116) 佐々淳行《危机管理要诀之 2——80 年代斗争领导人的条件》，PHP 文库，1984 年，186—195 页。
- 117) 佐々淳行《金日成阁下的收发报机》（读卖新闻社，1992 年），改订文库版（《神秘的独裁者金正日——“大浦洞”导弹、谍报、恐怖活动、绑架》，文春文库，1999 年）297—298 页。
- 118) 被普遍认为毛泽东政治遗嘱的 1966 年 7 月 8 日致江青信。
- 119) 这一开恩不免引出毛是否明示或默许断刘少奇命的疑惑。
- 120) 郑义《红色纪念碑》，台湾华视文化公司，1993 年，253 页。
- 121) 沈阳军区某集团军中校宣传干事张正隆（1947— ）在《雪白血红》（1989）中，开掘了 1937 年微山湖西“肃清托派”时处死屈打成招者的这一事例（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2 年，174 页）。生动再现国共东北决战的该长篇报告文学，因“美化林彪”之嫌和涉及一些敏感的人、事而遭禁，但作者 1993 年以《红情》得解放军文艺奖，故其严肃性、力度毋庸置疑。
- 122) 张正隆《雪白血红》，200 页。
- 123) 详见郑义《红色纪念碑》。
- 124) 枪决子弹费要家属付的做法 80 年代受到刘宾雁等有识之士的谴责，而吉姆·罗杰斯 1990 年旅经中国时在西北仍听当地人介绍是由本人或家属付（吉姆·罗杰斯《骑摩托的投资家——吉姆·罗杰斯之路》[1994 年]，日文版[林康史、林则行译《大投资家吉姆·罗杰斯周游世界》，日本经济新闻社，1995 年]84 页）。
- 125) 司马辽太郎《漫游历史长廊 40 台湾纪行》，朝日新闻社，1994 年，486 页。
- 126) 小渊已无语言能力，而无其托付则官房长官青木幹雄自封代首相即成非法，青木为此杜撰病床榻嘱托，结果受到国会追究、舆论抨击。（佐野真一《播放莫扎特的“总理病房”——封锁消息的 1 个月，病房的小渊惠三和家属的真相》，《文艺春秋》2000 年 6 月号，134—145 页）
- 127) 林彪 1966 年 5 月 18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就透露了毛为解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问题而调兵遣将。
- 128) 葛军《外交部长特别代表南非行》，北京《世界知识》双周刊 2004 年第 21 期，58 页。
- 129) 香港《亚洲周刊》2004 年 6 月 13 日号报导：政协主席李瑞环视察广东时非公开地表示“6. 4”因缺乏经验而开枪是错误。（47 页）
- 130) 刘亚洲《信念与道德》。
- 131) 不紧靠海的安徽、江西也可归作泛东部近海地区。本文作者在《由中日的政治文化、国际战略看东亚共同体的可能性、方向性（上）》（本刊 17 卷 3 号，2005 年）中，对建国后 4 代中共领导层籍贯分布的变迁及意义有所阐释（109—112 页）。
- 132) 毛 1974 年 7 月 17 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开“帽子工厂”和“钢铁公司”，江说“钢铁公司送给小平同志吧”，邓沉默片刻后正视江道“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 256 (256)

- 133) 据稻垣清《中国新领袖 Who's Who》〔东京〕弘文堂，2003年）不完全统计，第16届中央委员中江苏、浙江人分占13.1、6.6%，比例居1、3位（第2为山东人，10.6%）。〔11页〕
- 134) 《日本经济新闻》2005年2月7日报导《中国领导层的新登龙门：共青团和苏州帮崛起》。
- 135) 香港资深报界人士陆铿故意提及胡耀邦与王震的同乡关系，胡随口答道老家相同而志向相异，结果引得王不快。（杨炳章《邓小平 政治传记》〔1998年〕，日文版〔加藤千洋、优子译，朝日新闻社，1999年〕268页）使整篇访谈成为倒胡“炮弹”的这番“胡说”，使人想起“湖南人的强悍勇猛，骡子脾气”（韩文甫《邓小平传 革命篇》，台北时报出版，1993年，39页）。
- 136) 胡德平访谈《胡耀邦长男谈“靖国、政冷经热”》，《文艺春秋》2005年3月号，181页。
- 137) 戴晴《在中国发行〈长江！长江！〉经过》，戴晴编《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英文版，1994年），日文版（鹭见一夫、胡玮婷译《三峡大坝——围绕建设是非的争论》，筑摩书房，1996年）55页。
- 138) 周恩来的该命令引起空军个别部队的抵触情绪（李文卿《近看许世友》，218页）。
- 139) 毛死后叶剑英为对付上海民兵，叫无锡、苏州一带60军进入1级战备并听许世友令。且不说不容亲“四人帮”的南京军区司令丁盛染指，连华国锋欲接管上海后让彭冲指挥该军时，汪东兴都担心是许的老底子而别人调不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162、273页）
- 140) 李文卿《近看许世友》，98页。
- 141) 众多史料表明，黄克诚对彭德怀本无帮派关联，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大金刚”在林彪谋变、外逃的紧要关头也全然无知。
- 142) 详见李文卿《近看许世友》第3—7章（39—104页）等。
- 143) 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下册649页。
- 144)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162页
- 145) 南空政委江腾蛟被指控参与暗杀毛而被以杀人未遂罪等判18年徒刑，但林立果召集并指定江牵头的1971年3月上海“三国四方会议”，空5军政委陈励耘以为议题是与张春桥文斗。林彪出事后传达该“黑干将”带枪拟行刺而后证明冤枉免于起诉。他始终不平道“我怎么会谋害毛主席！”，而狱中纪登奎提醒他鲁珉已交待要去浙江陈处驾轰炸机炸毛专列，（司任主编《“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410—417页）鲁珉的真相却是因知轰炸机部队中没几个林派人物才故出此计敷衍（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363页）。
- 笔者由此想到1943年“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国国民党谣传王实味被杀，经毛授意、中央社会部策划王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澄清，称自己是托派本应枪毙但毛主席让我工作云云，而使蒋方宣传输了一招的这位演员会后即回看守所，握紧双拳恨恨地说：“今天我是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己，我不是托派！我不是特务！”（郝在今《中国秘密战》，317—318页）让人如此忍辱负重甘背黑锅足见中共操纵心灵有术，及维护集团荣誉的压力亦和个人名声一般犹如天大。
- 146) 调一个连、一架飞机都要军委主席及总参谋长批准的制度起自毛泽东时代，但“文革”中有顶层特权者肆意调机（如权延赤《杨成武在1976》中的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违章现象。

- 147) 周恩来 1949 年 10 月 15 日在被称为全国首次公安会议的公安高干会上，力说国家安危一半系于公安，
“军队是备而不用，你们是天天要用的。”（郝在今《中国秘密战》，412 页）
- 148) 2000 年世界人寿保险费中 26% 是日本人交纳，而日本人口、国民总产值占世界比例分别仅为 2%、13%，
保有合同额对国民所得比率的 5 倍以上也居世界第一，大大超过欧美的 1—2 倍水准。（水口启子《人寿
保险公司：变革和消失》，东洋经济新报社，2002 年，17—18 页）
- 149) “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不战而
屈人之兵，善之善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 150) 见张正隆《雪白血红》、王树增《中国人民志愿军征战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 年）。
- 151) 陈敦德《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最后交手》和刘亚洲《金门战役检讨》都提到，当时头脑最清醒者为华东野
战军主管作战的副司令粟裕，可惜这位大将的意见未受到前线指挥官的重视。
- 152)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514 页。
- 153) 16 世纪战国名将织田信长爱唱的这首民谣至今在日本影响深远，诸多事例之一是小泉纯一郎大学时代特
意抄录下来（松田贤弥《无情宰相——小泉纯一郎》，讲谈社，2004 年，22 页）。
- 154) 语出韩国学者李御宁著《“浓缩”志向的日本人》（[东京] 学生社，1982 年）。
- 155)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 年，382 页。
- 156) 刘亚洲《信念与道德》。
- 157) 同注 101。
- 158) 最终由 2 兵团司令程子华认定属英雄行为（张万隆《雪白血红》，397 页）。
- 159) 1933 年“1. 28”上海事变中日军 3 工兵用爆破筒炸开守军阵地铁丝网，因中弹和上级军官处理导火索
失误而丧生，陆军为煽动军国主义狂热遂编出捐躯开路的“肉弹 3 勇士”假事迹。
- 16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在访谈录《中国飞船》（《人民日报》2003 年 10 月 17 日）中，强调
了“把航天员安全放在第一位”的理念，而本文重视不修饰“逃遁”名称这一事实。
- 161) 重庆谈判尾声时民盟主席张澜提醒“走为上”，毛遂于《双十协定》签订翌日返延安。（郝在今《中国秘
密战》，352 页）张后上蒋政权黑名单而被中共营救，建国时出任中央政府副主席。
- 162) 毛 1956 年乘机遇雷雨险情，后不久被中央禁止飞行以防不测，仅 1967 年武汉事件时为紧急脱险才破例。
（李克菲、彭东海《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年）
- 163) 权延赤、杜卫东《共和国密使》（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年）披露，毛泽东对某中将不肯接任不快而提
出学“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周恩来在会上严厉批判个别高干怕死还不如马援，该人羞
愧难当之余重新请缨但未获准而痛悔终身。（3—4 页）林彪拒赴朝鲜也给毛留下了永不消失的杂音（苏晓
康、陈政、罗时叙《“乌托邦”祭》，373 页），但值得注目的是二人都未因此当即直接蒙受不利待遇。相
反，毛 1956 年党代会选中委时把可给自己的一票投给林（权延赤《龙困与微行》上部《安得猛士守四方》），
58 年还增选他为党中央副主席。
- 164) 张正隆《雪白血红》中的开小差便有怕死、怕累、厌战 3 种（170—172、239、316 页）。

- 165)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44—45 页。
- 166) 弗里得曼《雷克萨斯和橄榄树——读解全球化》（1999 年），日文版（东江一纪、服部清美译《雷克萨斯和橄榄树——全球化的真面目》，草思社，2000 年）下册 8—9 页。
- 167) 王树增《中国人民志愿军征战纪实》，下册 543—545 页。
- 168) 江泽民 2000 年底被香港记者问支持董建华任香港特首是否“钦点”等而不悦，说本可按“闷声大发财”精神不答但作为长者要指出你们幼稚。被视为不逊的此番道白中该南方俗语颇有江北商都出身的江及当代中国之特色，而“初级阶段”语出邓小平规定的其时中国社会主义性质。
- 169) 1989 年 10 月 26 日接见泰国总理时的谈话《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邓小平文选》第 3 卷，329 页。
- 170)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云：“1971 年毛初次会见季辛吉，毛引用《红楼梦》中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美国的处境。可是这句话怎么也译不清楚。”（116 页）按：毛初见基辛格为 1972 年，且美方解秘的数回晤谈记录中不见此句，但引王熙凤言和难倒翻译却符合毛风格。如毛确语出“大有大的难处”则或当亦含感叹本国之意。
- 171) 陈敦德《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最后交手》（1995 年）称，炮击金门使用的部分旧式火炮原已准备淘汰，此次借机将旧炮及为其库存的弹药用掉（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2002 年，286 页）。
- 172) 出自解放军军事学院首届院长刘伯承的提议（南山、南哲《周恩来生平》，上册 670 页）。
- 173) 张正隆《雪白血红》，352—359 页；少华、游胡《林彪这一生》，238—246 页。
- 174) 见王树增《中国人民志愿军征战纪实》下册 563—567 页。
- 175) 叶飞《叶飞回忆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8 年。
- 176) 叶飞《叶飞回忆录》等。
- 177) 朱建荣《毛泽东的越南战争——中国外交的大转换和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 年）中，有关于 1965 年交锋的详述（295—297 页）。
- 178) 给某香港财阀充当左膀右臂的日本人作如是说（加藤鉦《八佰伴 天真的失败》，日本经济新闻社，1997 年，85 页）。
- 179) 台湾《中国时报》2000 年 7 月 20 日报道《苏志诚郑淑敏：李登辉江泽民确有直通管道》。
- 180)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中有详述（170—179 页）。
- 181) 同注 40。
- 182) 林语堂《苏东坡传》（1947 年）序曰：苏之人品“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台湾〕张振玉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 年，6 页〕
- 183) 毛说自己在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是中国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首先仍然是中国人。（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202 页）周答记者问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是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人时，称自己在作为共产主义者之前首先是中国人。（尼克松《领导人》）
- 184) 李志绥称不理解毛的铁石心肠，推测或因目睹过多死亡而对人类的痛苦无动于衷，还说未见对家人牺牲

表露过任何感情，失去亲人只让他觉得自己命大能长寿。（《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116—117 页）笔者觉此言为俗人之见，毛怀念杨开慧由《蝶恋花·答李淑一》（1957）即不难领略，对丧子更悲痛到 1959 年庐山会议上讲“使作俑者，其无后乎！”时哽咽。抄李白“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慰儿媳，体现了政治思想和宇宙情思所致的高度达观。

- 185) 周托人将“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台湾，收到一定的统战效果。（南山、南哲往《周恩来生平》，上册 808 页）原军统大特务沈醉在《我这三十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中，记述了获特赦后目睹戴笠墓居然完整的保存下来时的意外和激动。（174—175 页）

中国の覇権軍国化の危険性と平和的台頭の安全弁（上）

本稿は『超限戦——地球化時代の戦争と戦法に対する 2 人の空軍大佐の想定』（喬良・王湘穗、1999）の軍事新思考を手掛りに、中国の覇権軍国化の危険要因と安全装置を探る。

前半では次の安全弁を詳解する。①儒教の道德律と大国の矜持に因る国家暴走の危険の低さ；②改革・開放の進展に伴う人道化；③軍の独断・暴走を不可能にする統治体制と自縛装置；④中国人の現世至上・自身中心と現代の「小皇帝」現象に因る無力・厭戦；⑤「窮則独善其身」（窮乏すれば我が身だけを善くする）の観念と「実利社会主義」路線に因る平和願望；⑥伝統に根を下ろし観念形態を超脱した中共政権の政治・軍事・外交の現実主義。

（XIA, Gang 本学部教授）